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中国人文学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扩展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类综合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本刊顾问

奚爱国 冯 泉 常本春 余 珽
袁建华 高 健 孙 丽 郭东升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刘步健
副主任 陈 锋 朱 杰 夏 涛 钱照亮
魏晓蕾

编 委 (按笔画为序)

韦 敏 李 业 李 军 吴元庆
张吉林 张美云 张思东 陈 思
龚万达 潘庆磊

主 编 朱 杰
副主编 陈 思

目 录

2024年 第3期 总第149期

主 管: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主 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吉 强
责任编辑:蒋建忠 鲍跃华 王天海 宋 好
赵晓锋

政党制度

-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伟大政治创造研究——基于政党制度类型比较 / 梁晓宇 4
-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契合互动 / 卢 鹏 臧秀玲 14

统战理论与实践

-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内涵、构成与本质 / 李 云 20
- 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表达的构成要素、功能及创新实践研究 /
宝应县委统战部、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课题组 27
- 基层统战工作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探析 / 齐春雷 33

中华文化

- 论统战文化在文化自信中的独特价值与重要作用 / 王天海 39
- 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价值与路径研究 / 李 婕 46
- 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圩、堤古村落的保护与利用——以宿迁为例 / 丁璐璐 51

封面设计:姜 嵩

封底篆刻:韩文忠

地 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 编:210007

采编平台网址:<http://jsyb.cbpt.cnki.net/>

电 话:025-84287222

传 真:025-84287298 转 7221

刊 号:ISSN1672-3163 CN32-1559/C

印 刷:南京千字文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 年 6 月 18 日

定 价:8.00 元

民营经济

国内民营经济研究 20 年:现状、热点与趋势——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 黄若洲 何建宁 56

学习与思考

探索省域现代化的中国经验与时代价值

——评《省域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基于京沪苏浙鲁粤六省市的分析》 / 刘志彪 68

论人的本质及其现实性: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 / 谢 震 王法森 7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研究 / 董西飞 76

本刊启事

本刊已加入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龙源期刊网、台湾华艺等数据库,故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已同意稿件入编上列数据库上网发行,授权本刊代理其稿件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络传播权,本刊不再寻求作者授权。本刊一次性所发稿费,包括纸质版、光盘版、网络版及其全文数据库著作权使用费及稿酬。

期刊基本参数: CN32 - 1559/ C * 2000 * b * A4 * 80 * zh * p * ¥8.00 * 2500 * 10 * 2024 - 03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伟大政治创造研究

——基于政党制度类型比较

梁晓宇

摘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伟大的政治创造,其创造性体现在是一种独特的政党制度类型。深刻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政党制度类型方面的创造性,需要深入分析其与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政党制度的不同,需要比较其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不同,需要全方位分析其与当今西方国家政党制度的差异性。通过与其他政党制度历史性、现实性的比较,才能深刻认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创性及对世界政治文明和政党学说的重大贡献。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创造性;类型

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造性的理解,学界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的探讨。学界普遍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层面去考察和研究这一制度,“并未从学理层面将其视为我国一项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党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党制的新型政党制度进行探究”^[1]。对这一政党制度的创造性的研究存在“点到为止”的情况,即强调其独创性,但没有深层次探讨其独创性的具体体现,特别是对政党类型的重大贡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创性,首先体现在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政党制度类型。以迪韦尔热为

代表的西方政治学者将政党制度从数量上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尽管后来萨托利对这种分法进行了突破,把政党体制分为一党制、霸权党制、主导党制、两党制、有限多党制、极端多党制、粉碎型体制,并将它们一一归入竞争性政党体制和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两大类中^[2],但还是没有脱离一般意义上的政党类型划分。中国政党和政党制度的产生均晚于西方,这就导致西方政党学说过早影响到中国政党问题研究,特别是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确立的时候,一些研究已经受到了西方政党制度话语的影响。

收稿日期:2024-05-09

作者简介:梁晓宇,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教授,四川省党建新型智库、四川省党性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九三学社四川省委员会思想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统一战线理论。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23BKS04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对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政党制度的深刻反思，是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教训的积极汲取，是对西方政党制度的重大突破。中国的政党制度探索经历了一个由西向东、由外而内、反求诸己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试错纠错，在试错中学习、比较、借鉴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伟大的革命实践中催生了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伟大创造，在本国土壤中培育出适合本国国情、具有巨大生命力的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和新中国成立75年的历程表明，这一制度具有西方政党制度不可比拟的优势，这一制度不属于两党或者多党竞争的竞选制度，也不属于典型的一党制，而是坚持共产党长期执政，多党派长期合作。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造性的研究，应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为依据，充分挖掘其独特价值，白皮书英文版对这一制度的“新型”的定义为“A new model”，意为一种全新的模板、模型或者范式，由此可以理解，“新型”意味着一种不同于过去和当前其他国家的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同于民国初年的多党竞争制

中国在清末民初出现了组党建党的高潮，但这一历史时期政党组织的社会基础非常薄弱，广大民众缺乏组党建党的热情。清末地方谘议局对选民的选举权进行了限制，要求5000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为基本条件，5000元对广大基层人民群众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数目，这就造成了绝大多数群众没有选举权的现象，也导致了广大民众对政党和选举的陌生。1911年，清政府解除党禁，国民可以自由组建政党，从这一时期一直到辛亥革命后第一届国会成立，先后有300多个冠以“政党”名称的政治团体建立，形成了民国初年独有的政党林立现象。辛亥革命胜利之后，资产阶级的代表认为民主的时代已经来临，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必须要参加竞选，一时间不仅有

新的政党产生，而且加入政党的人数也在增加，很快就形成了多党竞争的局面。

民国初年成立的这些政党，除了少数几个规模比较大的以外，其余基本上不与广大民众发生联系，这也决定了政党在这一历史时期不可能成为社会前进的主导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比较系统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对政党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活动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宋教仁的政党政治思想与责任内阁制紧密相连，责任内阁制只能由政党组织，而且是纯粹的政党内阁，为了防止共和体制走向个人独裁，因此要通过两个政党以合法手段进行竞争，这种竞争会使共和制有牢固的基础，也可以促进政党的健康发展。在当时的政治人物中，宋教仁的政治思想是比较先进的，体现了代表资产阶级进步势力的革命党人对民主与共和的真实追求，也体现了他们对封建势力的坚决抵抗。辛亥革命前后，比较有影响力的政党有国民协会、社会党、中华民国工党、统一党、统一共和党、共和建设讨论会、民主党、国民党等。在第一届国会召开之前，大大小小的政党经过内部分化、党派斗争、合并等，最终形成了三大派别（革命派、立宪派、地主买办阶级）、四大政党（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和国民党）、两大阵营（以孙中山、宋教仁等为代表的进步阵营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阵营）。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正式国会应该在10个月之内召开，并制定出宪法，产生内阁。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国会，参议院议员274名，按照地域主义原则选出，众议院议员596名，按照每80万人一名议员原则，由各省选出。参众两院选举法公布之后，各政党为了争夺席位展开了激烈角逐。国民党方面，宋教仁力争国民党获得半数以上席位，然后成为在朝政党；共和党方面，要求党员认真学习研究选举法，做好选举工作，不能投票给其他政党；统一党方面，视国民党为劲敌，为了达到不让国民党胜出的目的，

突击发展党员，为选举多举措筹备经费；民主党方面，通告全国，制造声势，想尽一切办法提升自身影响力。从以上政党的产生及竞争关系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试图用西方的政治规律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初具规模，先进人士开始向往和效仿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试图通过移植西方的政党制度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二是民国初年的政党制度属于比较典型的多党竞争制，各个政党之间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为了获得议会席位，不惜采取金钱收买的不正当竞争手段。三是民国初年多党制的尝试失败具有必然性，通过对民国初年政党与国会的关系分析，可以看出，民国初年政党政治运行基本上是照搬了欧美的政党制度，这样的政治尝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积贫积弱问题。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同于民初的多党竞争制。一是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不分大小、成立时间先后，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中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而民国初年的多党制，只有少数政党才有角逐国会的机会，一些小党迫于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与其他政党合并。二是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基本框架下，中国的各民主党派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性基本上涵盖了中国所有阶层。而民国初年的政党只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三是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根本目的上是一致的，在目标方向一致性的基础上又存在着组织形式的多样性，体现了合作共赢、尊重差异的特征。而民国初年的各个政党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多党竞争只是部分社会人士的一种游戏规则。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同于国民党一党专制

孙中山早年十分推崇西方的多党制。但民国初年多党竞争制带来的问题及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不断胜利，使他逐渐放弃了原来的主张，逐步

形成了“以党治国”思想。但是，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他将党员分为不同的层次和级别，即首义党员、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孙中山关于政党思想的局限性被蒋介石利用，后者在国内大力推行国民党一党独裁制。一是一党专权。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坚持中国国民党为“中国唯一不二之政党”^[3]，要继承国父的遗志，决不允许多党合治。尽管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有政治分歧，国民党其他领袖之间也不断争斗，但在国民党一党专权方面，他们是没有异议的。国民党三大通过的《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明确提出：“中国人民在政治智识与经验之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者，即产生婴儿之母。”^[4]国民党贬低人民群众，自己自吹自擂，名义上是代表人民群众履行权利，实际上是想把权力集中在国民党一家。二是个人独裁。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决定实行总裁制，规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要对总裁负责。三是千方百计控制民众思想。控制民众思想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国民党一党专制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统治，国民党“一方面大肆宣传封建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千方百计限制扼杀其他思想的传播”^[5]。1930年，国民党出台了《出版法》，对报纸杂志的出版作出严格的限制性规定，之后又制定《宣传品审查标准》，规定凡是宣传共产主义、批评国民党现行政策以及要求民主的宣传品，一律禁止出版。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同于国民党一党专制。一是民主党派追随中国共产党是一种主动的、发自内心的选择和认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严酷革命斗争中，各民主党派的创始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从朋友式的同情发展到全身心拥护，他们在比较中找到了实现自身理想之路，即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伟大事业，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肝胆相

照、荣辱与共。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各民主党派并不认同国民党的政治主张，一些民主党派是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权及蒋介石个人独裁统治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例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民主义同志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这些组织是国民党内部反对蒋介石的力量自发组织和建立起来的，后来他们都站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阵线一边，参与了新中国的筹备、创建和新政权的巩固工作。二是中国共产党支持民主党派自身发展，这与国民党打击打压限制民主党派发展不同。1946年7月，国民党先后指使特务暗杀了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1947年10月，国民党西安警备司令部枪杀了著名的民盟人士杜斌丞。1947年10月，国民党中央社发表声明，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司徒雷登建议民盟“光荣解散”，迫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公开发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民盟被迫解散。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共中央支持民主党派发展成员，“中国这样的大国，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在有五百多万党员的共产党员的旁边，各个民主党派成员太少了，就很不对称”^[6]。新中国成立初期，各民主党派组织建设普遍存在组织不纯和领导机构不健全、成员数量较少、对民主党派性质认识不统一等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各民主党派对组织发展工作作了调整，组织工作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民主党派成员数量也从1950年的12000多人增加到1953年的32000多人。三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互帮互助的友好合作关系，这与国民党敌视各民主党派有着重大区别。尽管民主党派提出过“中间路线”，但是国民党的镇压，特别是民盟被迫解散让民主党派认识到“中间路线”行不通，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和帮助下逐渐放弃“中间路线”，转向支持、拥护中国共产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教育、引导民主党派，到现在中国共产党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以执政党建

设带动参政党建设，实现执政党建设和参政党建设的有效互动，这与国民党想方设法壮大自己而削弱民主党派形成鲜明的对比。四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党际关系时采取的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方针，这与国民党排除异己力量，不允许其他政党发声形成强烈反差。例如，抗日战争时期迫于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成立了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两个组织，允许其他党派参加这两个组织。但是，在总裁制的影响下，国民党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只给了共产党和中间党派10%的名额，且只是作为文化团体和经济团体的代表人士，并没有真正承认其他党派的平等地位。在同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实施的“三三制”原则，“这样的政治性战略、包容性谋略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其他党派参政的多党合作范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7]。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同于苏联一党制

了解苏联最终为什么会实行一党制，必须要了解俄国的国情、资产阶级革命情况，以及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组党建党情况。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但并没有与沙皇彻底决裂，而是保持了一定的利益联系，也未在政治上提出强烈的诉求。1904年，沙皇的专制统治开始受到国内的猛烈批判，为了摆脱困境，沙皇政府希望通过发布对外战争来缓和国内社会矛盾，于是发起了与日本争夺在中国东北权益的日俄战争，战争以俄国失败而告终。随后，俄国国内出现了大规模的聚集和游行示威事件，特别是1905年1月，数万名工人和社会各界人士集结在冬宫广场，要求沙皇实行君主立宪。被逼无奈，沙皇于1905年10月颁布了《整顿国家秩序宣言》，规定了人民有结社自由，俄国的资产阶级认为此宣言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俄国的政治生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样一个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下，各种政治势力纷纷组建政党，发表政治观点，一批政党应运而生，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俄罗斯人民同盟、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等，这些政党一经成立便投入到国家杜马竞选中。但是，

由于俄国资产阶级发展落后、资产阶级本身软弱、不敢与封建专制势力彻底决裂等原因，资产阶级的政党代表在议会中的权力非常有限。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建立了国家政权。列宁设想几个政党建立合作和联盟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巩固苏维埃国家政权。布尔什维克党同左派社会革命党合作建立了联合政府，但合作时间非常短暂。1919年，左派社会革命党与俄共（布）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产生重大分歧从而分道扬镳。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同于苏联一党制。一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执政之前与一些政党有过短暂的合作和交往，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合作，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各民主党派的主要创始人已经有了密切的交往。例如，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与毛泽东相识，之后又有书信往来，在重庆谈判期间交往尤为密切。民革创始人之一谭平山早期是共产党人，后加入国民党，在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之后，谭平山退出了国民政府，因参加南昌起义被武汉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后来与组织失去联系，随即萌生创建第三党的想法。二是各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成立前经过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交往，完全认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认同新民主主义理论，而俄国的其他政党最终没有深刻理解并认同俄共（布）的政治主张。三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支持民主党派发展，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形成了新型的政党关系，“这种新型政党关系的形成不是偶然性的，而是中国民主革命中，社会各阶级和阶层、各政党和政治派别的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8]。四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最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八个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构成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而苏联形成了工人阶级政党单独存在（苏共作为唯一合法政党单独执政），没有其他政党参加的一党制体制。当然，最终形成苏共一党执政的局面并不是列宁的初衷，

“革命后联合执政的努力遭到失败，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过错，实行一党制也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初衷”^[9]。1922年底苏联成立之后，只有少数左派革命党人加入了俄共，参与反苏联的政治力量理所当然遭到镇压。1923年到1924年，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先后解散，苏联境内除俄共（布）外，没有其他政党存在。

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同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

“东欧”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非地理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出现了建党高潮，在苏联的帮助下，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共产党成为执政党。1945年5月，波兰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获得解放，1948年，波兰统一工人党成为执政党。匈牙利共产党成立于1918年，1945年4月，匈牙利在苏军的帮助下获得解放，1948年6月，改组后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成为执政党，当时该党有党员112.7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2%。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5月，捷共在1945年5月发动了布拉格起义，与苏联红军联合，推翻了法西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统治，并于1946年3月在捷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了其执政地位。罗马尼亚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5月，1944年8月，该党领导反对法西斯统治的武装起义，推翻了本国的军事独裁政权，罗马尼亚随即建立了新政府，确立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是阿尔巴尼亚第一个政党，成立于1941年11月，1945年5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打败了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的入侵，1945年11月，全国解放，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自然成为国家的执政党。德国共产党成立于191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被分割为西德和东德，东德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德国统一社会党为执政党。保加利亚共产党成立于1919年5月，其前身是1893年成立的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

1938年,保共中央将工人党和共产党合并为保加利亚工人党。苏德战争爆发之后,保加利亚工人党坚持不懈地开展反对卖国政府的斗争,并于1944年9月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推翻了西麦昂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保加利亚工人党经过长期的努力于1948年初确立了其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前身是成立于1919年4月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南斯拉夫在苏联的帮助下于1945年5月获得全国解放,建立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

由此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苏联的帮助下,东欧的阿尔巴尼亚等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世界逐渐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南斯拉夫在解放后允许一些民主政党参加政府,但南斯拉夫共产党并没有把他们当作真诚的盟友,他们“并不是共产党人的联盟伙伴的代表”^[10]。由于种种原因,南斯拉夫的多党合作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南斯拉夫最终实施的是一党制,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也实行一党制。波兰有三个政党,分别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统一民主党和民主党。其中,波兰统一工人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波兰的领导党,于1948年12月由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左翼合并而成;统一民主党是以农民、农业知识分子为主体组织的政党,主要在涉农领域和行业中发展党员和开展活动,属于比较典型的代表农民阶级的政党,于1949年11月由原来的农民党和波兰农民党合并而成,属于非马克思主义政党;民主党于1938年成立,主要在手工业和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属于非马克思主义政党。

东欧4个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的主要形式包括参加国家权力机关、参加政府、参加统一战线组织、参加党政联席会议、对外进行党际交往。在参加国家权力机关方面,“民主政党的议员在议会中组织议会党团或党员俱乐部,议会党团在议会中提出的意见,一般都经由本党的议员讨

论通过,议会党团发挥协调、议政、约束等功能”^[11]。在参加政府方面,各民主政党在各级政府中都有一定数量的成员担任领导职务。在中央一级,有民主政党成员担任副总理;在地方,有民主政党成员担任省长、副省长,以及乡长、副乡长。在参加统一战线组织方面,各民主政党利用这一组织形式反映和整合不同阶层的利益,帮助组织成员提高政治觉悟,参加国家一些政策制定的讨论等。在参加政党联席会议方面,共产党会同民主政党就国家的重大决策在共产党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协商,各个政党也会邀请其他政党参加本党召开的代表大会、中央全会等,各个政党也会联合起来成立一个联系沟通机构。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同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一是东欧四国虽然允许有其他政党存在且有一定程度的合作,但这种合作是多党联合执政体制,不利于加强执政党的领导,不利于维护国家政权稳定。二是多党合作组织形式的权限和职能不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运行的重要机构和组织形式,能够妥善处理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关系,能够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实现高效的治国理政,这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统一战线组织职能不同。波兰民族复兴爱国运动的主要职能是表达民意、调节冲突;保加利亚祖国阵线的主要职能是监督和动员国家公职人员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民主德国全国阵线的主要职能是引导群众执行人民议院通过的法律和决议,巩固和加深各级代表与人民群众的信赖关系;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贯穿履职工作之中”^[12]。显然,东欧四国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分强调群众性而忽视凝聚共识性,这与人民政协在政治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构成上坚持广泛性、代表性和进步性的统一形成较为强烈的反差。三是在多党合作的框架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唯一的工人阶级政党,这与东欧四国工人阶级政党曾出现

过合并的情况不同。例如，德国统一社会党是由原来的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而成，波兰统一工人党是由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而成。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多党合作中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发挥出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作用，从而保证多党合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同于当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具有不同成因和形态，当今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已经成为独具魅力的好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方面独树一帜。

古巴在 1959 年获得独立，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但这个时候古巴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当时古巴国内主要存在 3 个革命组织：于 1925 年成立的人民社会党，1953 年由卡斯特罗组建的“七·二六运动”组织，以及于 1957 年由哈瓦那爱国学生组建的“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1961 年，古巴发生了著名的“猪湾事件”，与美国彻底决裂，为了寻求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宣布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使古巴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为了壮大革命力量，古巴 3 个革命组织于 1961 年 7 月合并为古巴革命统一组织，后来更名为古巴共产党。古巴的政党由多个政党归并为一个政党，从三派共治最终走向了一党执政，古巴共产党也成为古巴唯一的政党。虽然 3 个党派在组织形态上实现了统一，但在政策立场上却存在较大分歧。例如，1962 年，原人民社会党领导人埃斯卡兰特篡夺党的领导权失败后逃往苏联，1964 年，党内围绕罗德里格斯案件发生严重的党内斗争，1966 年，埃斯卡兰特在党内组建亲苏小集团，这使古巴共产党内部原人民社会党和原“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两派之间明争暗斗不断。但可以确定的是，古巴宣布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后，一直坚决反对多党制，为了巩固政权，也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在东欧国

家相继剧变的背景下，1991 年召开的古巴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仍重申坚持不搞多党制。2019 年 4 月 10 日，《古巴共和国宪法》（新宪法）正式生效，强调古巴社会主义制度不可更改、古巴共产党是古巴社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力量。

朝鲜是朝鲜劳动党一党执政，但是允许为朝鲜解放和独立作出贡献的社会民主党、天道教青友党等政党存在。朝鲜劳动党是在国家解放后的建国过程中与其他政党重组形成的。1946 年 3 月，朝鲜独立同盟改组为朝鲜新民党，并于当年 8 月与北朝鲜共产党合并为北朝鲜劳动党。南朝鲜劳动党于 1946 年 11 月由朝鲜共产党、新民党、朝鲜人民党合并组成。1949 年 6 月，南北朝鲜劳动党合并为朝鲜劳动党。朝鲜虽然有多个政党，但朝鲜劳动党始终把握着国家发展方向，社会民主党和天道教青友党是以友党的身份存在。社会民主党的前身是 1945 年在北部朝鲜成立的朝鲜民主党，主要由农民、知识分子、企业家以及宗教人士构成，朝鲜民主党于 1981 年改名为社会民主党。天道教青友党于 1946 年成立，主要由信仰天道教的农民组成。上述两个民主政党在拥护朝鲜劳动党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下，与朝鲜劳动党合作共处。

在越南现代政治生活中，除了越南共产党之外，还活跃着一些进步的民主党派，如复越会（1928 年更名为新越革命党）、越南青年党（也称越南青年高望党）、越南国民党等，这些政党多数带有资产阶级属性，但他们多数能与越共和谐相处、真诚合作。越南自 1975 年实现国家独立之后，民主党派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但基于复苏经济的需要，越共依然维持了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政党合作格局。需要说明的是，越南其他政党力量较为弱小，都只有几千名党员，影响的领域也比较狭小。越南其他政党在 1988 年先后召开代表大会，宣布停止活动，越南一党制格局形成。越南共产党在本国中的绝对领导地位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逐渐树立的，且越南一党制的形成没有经过流血冲突，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形成过程。

老挝于1975年废除了君主制,实行共和体制,老挝人民革命党通过取缔各地的政治组织和政治集团,巩固了人民革命党的执政地位,并完全确立了一党制体制。受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影响,老挝人民革命党内部和国内也出现过要求实行多党制的声音,甚至流亡海外的王室成员有恢复旧王朝统治的政治企图。面对重重困难,老挝人民革命党于1989年10月召开四届八中全会,特别强调老挝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思想基础。老挝第一部宪法规定,各族人民在老挝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老挝人民革命党是人民民主政治体系领导核心。

当今世界5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政党制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较之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一是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中国共产党主动帮助民主党派,而不是劝其解散;二是在有多个政党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的民主党派所发挥出的作用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非执政党所不能比拟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释放出的效能及对世界政治文明的贡献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所不能比拟的;三是中国的民主党派性质经历了一个科学合理的演进变化发展过程,最终由成立之初的资产阶级政党演变为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社会主义性质政党,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同于当今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

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西方国家的政党现象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在19世纪30年代,其政党政治就进入了制度化发展阶段,西方政党制度与选举制度和代议制度紧密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西方政党政治现象,政党制度也成为其他两种制度实施和运行的保障。西方学者对政党进行了很多种定义,如《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指出,“它指的是与一个或更多的政党竞争而赢得公

职选举为目标的组织”。按照西方学者对政党及政党制度的定义和标准,中国的民主党派和政党制度不能包含其中,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新性。目前,在欧美发达国家和受西方政党政治影响深刻的国家,根据政党数量、政党之间的关系及执政方式等,将政党制度划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实施多党制。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多党制可以有利于民意的充分表达。多党制一般采取的是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方式,比例代表制是各个政党根据其参加竞选的候选人得票的多少分配议席。相对一党制而言,采取比例代表制对成员数量较少的政党更加公平。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多党制出现了效率低下等问题。日益频繁的党派斗争不但增加了政治运作的成本,也造成了决策效率低下的弊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显然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一是中国的政党制度在数量上属于多个政党,但是所有的政党都围绕国家中心任务来开展工作。二是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能够充分履行参政党职能,中国共产党充分尊重民主党派参政党的权利,二者的关系是亲密合作的友党关系,不是西方多党制框架下的恶性竞争关系。三是从政党产生和发展来看,各民主党派作为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作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支力量,能够发挥作用,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作为我国多党合作格局中的参政党,不断发展进步,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四是从利益代表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于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而西方的多党制框架下每个政党都受到利益集团的驱使,是资本家的代言人,不同政党的区别在于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有所区别。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对西方政党制度的超越。一是“突破了西方政党制度基于结构关系的类型学分析框架”^[13]。西方政治学家对政党制度

类型的划分主要是基于政党与社会、政党与国家、政党与政党的关系分析，这种分法没有注意到政党之间的细微差异性，也没有考察政党功能方面的差异性，其分类方法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简单归类，具有片面性。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政党制度的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西方政党制度理论不能精准概括中国政党制度的本质特征。二是突破了西方以“竞选”“上台执政”“在野党”等为核心词语的评价标准。西方对政党制度合理性的一个评判标准就是将竞选等同于民主，他们认为，政党既然是民主的工具，那民主就应该体现在竞争性选举方面。在中国，所有政党都担负着民族复兴的责任，政党制度的建设也是围绕国家建设的需要，用西方“竞选-民主”的标准衡量中国政党制度显然是不合适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现出比西方政党制度更高层次的光荣使命和任务。三是突破了西方政党制度关于政党之间异体监督原则。作为西方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异体监督被西方学者们奉为民主的重要体现，他们认为同体是无法实施有效的监督，必须在执政党之外，有反对党或在野党存在才能有效监督政府。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只有执政党和参政党之分，没有在野党或反对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实行互相监督，在结构上不存在反对党的结构和机制。特别是2016年以来，各民主党派开展的脱贫攻坚和长江生态保护专项民主监督，拓展了民主监督的新路。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民主监督方面，各民主党派以开展考察调研、提出意见建议，参与监督落实、推动成果转化，加强经常性监督、进行政策宣讲等多种形式开展监督，坚持民主监督与建言资政相结合、民主监督与凝聚共识相结合、民主监督与自身建设相结合，在履行好民主监督责任的同时，彰显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巨大优势。

总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同于当代世界政党制度的任何一种类型，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曾

经出现过的多党竞争制和国民党一党专制，是一种完全崭新的政党制度，开辟了独特的政党制度道路，具有重大的开拓性意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经过70多年的发展，正向着成熟完备的方向迈进。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放在世界政党发展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中去考察，发现这一政党制度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这一制度是没有成功先例可借鉴、可遵循的崭新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新”并不意味着这一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没有遵循政党发展的一般规律；相反，这一制度的形成既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党情、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遵循政党政治发展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国家政治稳定又为这一制度进一步完善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2023年12月，中共中央出台《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意见》，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新时代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发挥好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发挥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比较优势，充分释放其制度效能。

参考文献：

- [1] 何旗，王婷.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主题脉络与进路展望——基于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2): 164.
- [2] 萨托利. 政党与政党体制[M]. 王明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78.
- [3] 季啸风，沈友益. 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三十册[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48.
- [4] 荣孟源.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658.
- [5] 刘仕平. 世界主要国家政党政治发展历程研究[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2：348.
- [6]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203.
- [7] 张满春, 郑鑫.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西方政党政治的双重超越: 基于主次双重范式的分析 [J]. 学习与探索, 2022(10): 62.
- [8] 张艺军. 风雨同舟七十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史 [M]. 北京: 学林出版社, 2001: 375.
- [9] 于洪君. 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不同成因及历史命运 [J]. 当代世界, 2015(1): 17.
- [10] 斯托扬诺维奇.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历史 [M]. 杨元恪,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9: 466.
- [11] 林怀艺, 于俊. 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的回顾与反思 [J]. 理论探讨, 2016(5): 126.
- [1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3.
- [13] 龚少情.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西方政党制度的实践超越及其类型学意义 [J]. 湖北社会科学, 2019(4): 48.

责任编辑: 鲍跃华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契合互动

卢 鹏 臧秀玲

摘 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文化底蕴、历史逻辑、领导力量与价值立场等方面保持高度契合。在此基础上,两者又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一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保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平稳推进,在维持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的稳定上有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创新,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增效赋能,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领航导向。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辩证关系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高度契合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优秀成果。两者在文化底蕴、历史逻辑、领导力量和价值力量上具有高度契合性。

(一) 文化底蕴:“和合”文化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都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崇尚和合理念、求同存异,

注重兼容并蓄、和谐共存”^[1]。“‘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代表性元素”^[2],其内涵是在尊重主体差异性的基础上,找寻不同主体之间的汇合点,包含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等精神品质。在这一文化理念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承认并尊重不同党派的差异性,以对话协商来化解争端分歧,实现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有机统一,形成了一体多元的结构模式。

“现代化与传统并非简单二元对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其传统文化的根基。”^[3]“和合”文化着重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走和平发展的

收稿日期:2024-04-28

作者简介:卢鹏,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臧秀玲,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研究”(23JZD02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科学术团体主题学术活动项目“文本、诠释与传播: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研究(1921-2021)”(20STA03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现代化，突出表现于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中始终秉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强调了文明交流与文明互鉴”^[4]，与其他国家共谋发展、共同进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大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通过求同存异的共性思维将人类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各个利益主体的高度依存态势，从而在兼容并蓄中寻找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5]。

（二）历史逻辑：承古启今

任何一种制度、模式都不是“飞来峰”，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其特定的历史逻辑。它们均源于深厚的历史积淀，经过长时间的逐步改进和完善，是内在驱动和自我演化的动态过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遵循这一演进逻辑。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孕育于近代以来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是近代中国历史不断演进和政治文明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辛亥革命后，中国尝试效仿西方国家实行议会政治和多党制，但政党政治实验最终失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标志着其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奠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基础。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顺利召开标志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深入反思中国历史整体脉络的基础上形成的，尤其是基于对近现代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全面审视。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上下求索，开始找寻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无论是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还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均未能扭转中国当时落后的局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成功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实现工业现代化的重要性，并“以俄为师”进行工业化建设。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逐渐认识到苏联现代化道路的局限性，在1959年底提出了“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建设目标。1979年，邓小平指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6]从“小康社会”的提出，到现代化“三步走”战略，再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三）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政治保证。党的领导是全方位、多层次且协调一致的，需要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和各环节全面贯彻落实。因此，在党政军民学等各个方面，党都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并且“哪个领域、哪个方面、哪个环节缺失了弱化了，都会削弱党的力量，损害党和国家事业”^[7]。因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领导力量自然也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系中，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属于“统领型政党”^[8]，这是与西方政党制度最根本的区别，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新”的主要所在。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国家的执政党，更是引领国家发展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具有宏观和战略的特性，而党的执政则体现在具体的政策执行和社会治理上。党的领导与执政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一种有机统一的政治实践。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涵盖了参与政治协商的原则、方向，以及在国家发展策略中的关键政策制定。党的领导也表现在鼓励并确保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能够有序参与国家决策和管理，支持他们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基础上开展自身建设，为他们更好地履行职能创造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9]。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实现现代化道路的正确探索,更不可能走出一条正确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人口众多的中国,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推动现代化建设必须依赖一支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先进阶级组织,承担着引导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重要责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展现出超越西方模式的先进性与高效性。

(四) 价值立场: 人民至上

人们的奋斗往往源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维护^[10]。人们在涉及利益的问题抉择中,形成对于利益问题的评判和取舍标准,也就是价值观。“价值观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交往和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关于价值问题的根本看法,是指导人们社会生活行为和社会生产活动的价值标准,也是人们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基本依据。”^[11]其中,价值立场又是价值观的最核心的部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都贯彻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12]。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上层建筑范畴的基本政治制度,客观上要以生产关系为基础,中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因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实现人民的权益为根本出发点。同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领导核心,决定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立场。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便将增进民众福祉与推动民族复兴视为其政治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绝不维系任何特殊群体或阶层的私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13]。这一论断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有多重体现。其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的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

本质属性,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政治立场和最鲜明的政治品格。其二,“国家治理的本质不是治民,而是民治”^[14]。在国家治理方面,宪法法律将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体力量,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是人民至上立场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其三,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特色之一,充分展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理念,是人民至上立场在经济领域的重要体现。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保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平稳推进

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稳定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能够平稳推进和快速发展的前提条件。稳定常常是与特定的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一整套制度设计、运行机制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平稳推进。

(一)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保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政治关系的稳定

现代性倾向于追求稳定,但现代化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动荡不安。拉丁美洲、北非以及亚洲的部分发展中国家便经历了这种困境,它们在追赶现代化的过程中遭遇了政治动荡的问题。通过对西方国家现代化历程的研究可以发现,拥有一个强有力的主导政党对于促进现代化道路政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在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为了能够让执政党更好地履行职责,避免权力过分集中,于是设置了在野党或反对党,这些政党是为了取代执政党位置、执掌国家政权而存在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相互拆台、互相内斗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让政府的提案很难通过,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情况十分突出,政府难以将政策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使得政府并不是很稳定。西方政党之间关系的紧张同时也造成了其现代化道路面临着不可避免的阻碍力量。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一个强大且成熟的政党领导现代化道路通常有助于维护政治稳定。因此,政治生活局面的和谐有

序、政府施行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展现了对这一理念的深刻理解和实践，是“我国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制度保证”^[15]。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主体中的各政党是通力合作、团结和谐的新型政党关系。在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体系内，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则扮演着参与协作与建言献策的参谋角色。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各民主党派的作用，充分保障他们的权益，并期望他们能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为国家发展献计献策。各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努力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消除了政党间对抗带来的政治动荡，确保了政治的平稳，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因此，在面对各种挑战时，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能够坦诚交流、共商国是，以确保政局的持续稳定，并保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被阻滞甚至中断。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保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社会关系稳定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超大型国家是中国基本国情。社会稳定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向纵深推进，我国机制体制改革加速演进，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社会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涵盖全社会的共同利益，还要兼顾社会的多元化诉求。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实现利益代表的广泛性，有助于对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广泛覆盖和持久保障，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社会关系得以稳固维系。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利用其强大的组织力量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与此同时，各民主党派则代表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建设者的具体利益，深化与社会各

界的交流合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政策制定赢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进而推动社会的整体和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一元领导”与“多元参与”的方式，有效地将各类政治和社会力量融入统一的政治框架，实现共识与差异的有机统一。它不仅促进了各种力量之间的协同合作，还有效化解了社会矛盾，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16]。要维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关系稳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除了要能够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之外，还要能够进行利益整合。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作为多党合作及民主协商平台，协商合作的运行既实现了整体性的政治整合，又畅通各界别的个性表达，有效地融合了不同利益需求，对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推动社会关系长期和睦起到“压舱石”的效用。例如，在“十四五”规划的制定和执行阶段，全国政协利用其协商平台，汇聚了来自各领域的委员智慧，众多提议已被吸纳。全国政协还借助委员讲座、宣讲小组和阅读活动等渠道，推广“十四五”规划的理念，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新发展

道路决定方向，方向引领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全面实现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领航导向，并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新增效赋能。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领航导向

时代催生蓝图、蓝图引领方向、方向推动发展。新时代以来，我们正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关键节点，也是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蓝图已经描绘、目标已经锚定，在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担的责任和追求的目标。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要紧紧围绕实现高质量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共同富裕、繁荣人民精神世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方面，广泛凝聚共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优势、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

经过 70 多年的发展，新型政党制度已成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但是，世界上任何一种制度都需要根据时代要求不断调整完善。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新型政党制度也需要根据需求不断强化服务功能，不断改革机制体制。具体而言，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始终秉持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贯彻群众路线方针。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要深入人民群众中进行调查，提出建议或制定政策要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二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目标的根本保障。党的领导决定新型政党制度的改革发展不偏向、不偏航，一以贯之地沿着正确道路走下去。三是始终支持、引导和保障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作用的发挥。中国共产党要充分保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的发挥；同时，各民主党派也要加强自身建设、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不断守正创新。四是始终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坚决抵制照抄照搬西方两党制、多党制，彰显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优势，打破西方政党制度话语垄断，增强制度自信、制度认同，提升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新增效赋能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仅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创造性地将这些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和强大的动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含着先进的理念和完善的制度架构，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政治制度与新型政党制度相得益彰，推动形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注入了时代活力。

全过程人民民主代表了一种全面、真实且高效的民主形式，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民主功能的有效发挥提供了必要的协同机制和力量支持。这种增效赋能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民主权利行使过程的完整性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独特之处在于将民主贯穿于政策制定的始终，并覆盖社会各个领域。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操作流程上呈现为一个连贯的序列，包括选举、讨论、决策、管理和监督等环节，这些环节在时间维度上有着继起性，它们有效衔接构成了完整的运行轨道。同时，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各环节均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等多个层面，以确保全面关照人民的实际需求和权益。这使得各个方面都能充分反映人民的意志，从而突破了西方国家所谓的单一“民主”的局限，体现出完整性特征。

第二，从民主运作形态的复合性来看，协商民主和票决民主相互配合，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复合性特征。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显著特征和独特优势。充分的民主协商使得各个阶层人民的利益能够充分表达，消弭其中的分歧，形成广泛共识，从而使得民主选举能够顺利推行、有序运作。票决民主使协商民主得到的结果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赋予协商民主成果的法定效力。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N]. 人民日报, 2021-06-26(2).

- [2] 王成, 李珊珊. 试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和合”文化意蕴 [J]. 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2): 125-133.
- [3] 沈湘平.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传统文化根基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2(8): 109-123.
- [4] 陆卫明, 邓皎昱.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维度 [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1): 20-37.
- [5] 李永胜, 张玉容. 论全人类共同价值对“普世价值”的超越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6): 77-84.
- [6] 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63.
- [7]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 [M].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9: 119.
- [8] 王天海, 王彩玲.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涵、发展逻辑与文明价值 [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20(1): 68-75.
- [9]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2022-10-26(1).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82.
- [11] 宇文利. 价值观与人类文明进步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2(11): 19-23.
- [12]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 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 [N]. 人民日报, 2018-03-05(1).
- [13]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64.
- [14] 张献生. 多党合作制度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基本作用 [J]. 政治学研究, 2017(4): 106-114.
- [15]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75.
- [16] 习近平. 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242.

责任编辑: 王天海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内涵、构成与本质

李 云

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中华民族属性的基础上突出共同体属性,它强调的是中华民族成员之间的共同命运和利益,它是联结中华各民族命运和利益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属于社会认同,是中华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知、情感归属和行为卷入。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构成包括主客体两个方面的构成。在主体构成上,中华民族全体成员是其认同主体。在客体构成上,一方面,它是对中华民族这一历史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认同,另一方面,它是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本质上就是中华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命运共同体的认同。

关键词: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把对各民族的民族认同提升为对中华民族的国族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是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路径。本文从内涵、主客体构成、本质等方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进行探讨。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内涵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主要包括三个概念,即“中华民族”“共同体”和“认同”。

(一) 中华民族的内涵

“中华民族”属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属性。“中华民族”一词由“中华”和“民族”两

词组合而成。根据陈连开考证,“中华”一词大约在晋代出现,是个多义词,区域上是指中原,扩而大之及于王朝直接管辖的郡县地区,文化是指中原传统文化。“民族”概念首先出现于欧洲国家,大约在 19 世纪末由日本传入中国,是民族与国家同一的含义。“中华民族”一词最先由梁启超提出。1902 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提出:“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但梁启超所提出的中华民族最初指的是汉族,他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1]。1907 年,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把“中

收稿日期:2024-05-24

作者简介:李云,广东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建构研究”(19BKS15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华民族”作为融合五族的整体，使“中华民族”初步具有了现代的含义。孙中山进一步明确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内涵，他放弃了“五族共和”主张，进而提出把中国各民族融合成中华民族的主张。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华民族”观念日益得到中华儿女的认同，进而成为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称谓。1939年，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2]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围绕“中华民族”的含义进行了充分讨论，费孝通明确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的命题，且指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格局。陈连开认为“中华民族”具有双重含义，他把中华民族既看作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又看作是各民族结成的民族集合体。由此可见，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在结合成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集合体，它是一个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中华民族属性的基础上突出了共同体的属性，它强调的是中华民族成员之间的共同命运和利益。

（二）共同体的内涵

在近代，最早提出共同体概念的是法国思想家卢梭，卢梭的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历经私意、众意、公意三个阶段。他认为，公意是共同体的核心和灵魂，“唯有公意才能够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3]。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出版《共同体与社会》，他采用二分法，将人类进程概括成“共同体”和“社会”。20世纪20年代，社会学家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根据社会关系分类，把共同体分为传统社会、情感共同体、价值合理性共同体、目标合理性共同体、法定社会、大型组织等类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和“抽象的共同体”，由此提出“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从唯物史观角度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是共同体建立的出发点，他认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构成了和谐真实的人类

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才是真正的共同体，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真正的共同体才能实现共同体中每个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

现代汉语词典对共同体的解释是，“共同体是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5]。从此定义可以看出，共同体是由人组成的一个集合体，共同性是共同体结成的基础，共同条件则是共同体结成的纽带。英国社会学家鲍曼认为，“共同体的一致性是由其同质性、共同性所构成”^[6]。共同性要素主要包括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血缘、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经济活动、共同的道德、共同的前途命运等，而这些共同性要素使人们具有共有身份、共通情感、共同利益和共享价值等纽带。共有身份是共同体成员享有的成员资格，只有成为共同体的一员，才能享有成员资格所带来的安全和福祉。除了确定共同体的内外边界，共有身份还能促进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的认同。“身份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背后都对应着主观认同。”^[7]中华民族身份就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共有身份，是其享有的成员资格。“中华民族以共有身份为基础形成身份共同体”^[8]，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是建构共同体的基础。共通情感是共同体形成与延续的黏合剂，是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产生情感能量、形成集体记忆和生成情感认同的纽带。中国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情感共同体。共同利益是共同体建构的利益基础，共同体主义者所倡导的共同利益是一种非排他性的相容性利益，从本质上大致可以区分为“安全”和“福利”两大类^[9]。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共享价值是共同体形成和延续的重要因素，共同体成员有了共享价值，就有了共同的道德信仰与道德秩序，就有了共同的价

值观念和价值追求。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共享价值,从此种意义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以共享价值为纽带的价值共同体。

(三) 认同的内涵

“认同”是个复合词,它由“认”和“同”组成。“认”其含义主要是认可、承认,“同”的含义主要是相同。因此,在现代汉语中认同有两种含义。一是认为跟自己有共同之处而感到亲切。二是承认、认可。“认同”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最早出现于 16 世纪的哲学研究中,后来,“认同”一词应用于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弗洛伊德最早从心理学意义上提出了认同的含义,他认为:“认同是个体与他人、群体或被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10] 认同理论中,最著名的是基于美国微观社会学符号互动论的认同理论和欧洲社会心理学所倡导的社会认同理论。以符号互动论为基础的认同理论是根据自我与社会的交互关系来解释人的社会行为,关注的是个体及个体角色行为。社会认同理论更加关注群体层面上的群体进程和群际间关系,在群体因素的基础上来研究群际关系、社会认同和社会影响^[11]。

(四)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内涵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属于社会认同,是一种包含多重共有身份的集体身份认同。王延中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成员和中国公民国族(中华民族)身份的集中概括”^[12]。

首先,它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身份认同。

“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13] 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的大家庭,中国各民族在这个大家庭中,生活上相互往来,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价值观念上交融互连,从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因此,中华民族成员身份认同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共有身份认同,是中国各民族的共有身份认同。

其次,它是中国公民国族身份认同。马歇尔

指出:“公民身份是一种地位,一种共同体的所有成员享有的地位。”^[14] 中华民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公民国族身份的集中概括。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就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承认、认可与赞同,进而产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认知、情感依附和行为取向。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构成

(一)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主体构成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人的集合体,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主体就是中华民族成员。中华民族包括哪些成员,中华民族的族体由哪些组成?目前,学术界形成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认为中华民族是大陆各族同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例如,马戎认为,“以中国全体国民(包括持中国身份证的 56 个民族成员、港澳台居民和持中国护照的海外侨胞)构成的‘中华民族’这个政治共同体作为我们的认同对象”^[15]。常轶军认为,“中华民族既包括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大陆公民和港澳同胞,也包括 2300 万台湾同胞,还包括 6000 万海外华人华侨”^[16]。二是认为中华民族是拥有中国国籍的中国公民共同体,中华民族只包括中国境内的 56 个民族及海外华侨,不包括海外华人。例如,沈桂萍提出,“中华民族应该是包括今天 56 个民族在内的、生活在中华大地上所有民族及其海外华侨的统称”^[17]。三是认为中华民族只包括大陆各族同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不包括海外侨胞。笔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应包括大陆各族同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其中,海外侨胞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他们是中华民族在海外发展的苗裔,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和与世界各民族发展友谊的桥梁,在东西文化的交融中起了先锋作用”^[18]。

(二)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客体构成

从中华民族的自身特点出发,中华民族共同

体是一个历史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就是对中华民族这一历史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认同。一是对中华民族这一历史共同体的认同。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在长期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过程中凝聚而成的，它是一个历史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用“四个共同”概括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19]“四个共同”既是各民族发展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华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历史依据。二是对中华民族这一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中华民族是中国的国族，是政治共同体。正如学者周平所言，“国族是特定的人群共同体，它以一定的历史文化为基础，更由于与国家内部结合而具有突出的政治属性，实质上就是政治共同体”^[20]。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各民族政治认同的客体，而中华民族则是一个具有更大时空范围、包容性更大的政治共同体。因此，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具有更广泛和更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心理基础，更容易被中华民族全体成员所认可和接受，有利于弥合分歧、达成共识和形成中华民族复兴的合力。三是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是我国56个民族组成的民族集合体。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结构，中华民族是一体，各民族是多元，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超越了以往的民族认同。“一个承认自己拥有不同民族群体的多民族国家，只有同时培育一种各民族群体的成员都拥护并且认同的超民族认同时，它才可能是稳定的。”^[21]四是对中华民族这一文化共同体的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所谓文化共同体，即是基于共同或者相似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定式而形成的社会群体，是一种特定文化观念和精神

追求反映在组织层面上的有机统一体。”^[22]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中国各民族在文化上兼收并蓄共同创造的，它以中华文化为核心，以共同的语言文字、历史记忆、传统价值观和共同心理特征为纽带，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因此，对中华民族这一文化共同体的认同既要认同中华文化的共性，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又要认可各民族本身的文化特色。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认同有利于将海外侨胞纳入“文化中国”，以民族文化身份为基础构建其认同的精神文化纽带，从而使其产生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挥更大作用。

从中华民族的核心内容出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是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3]因此，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核心内容。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本质与特征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本质

要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本质，首先需要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从中华民族的自然属性出发，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质上是社会共同体。二是从中华民族的文化属性出发，认为它本质上是文化共同体。三是从中华民族的国家属性出发，认为它本质上是政治共同体。学者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质的阐释更多是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某个方面或某个特性进行分析，较少从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历史渊源、共同现实利益以及共同未来愿景方面进行探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民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才有前途，才有希望。”^[24]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看，中华民族是各民族经过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统一体，在这个进程中，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从中华民族的构成看，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结构，各民族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从中华民族整体性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组成共同体的内部各元素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对于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习近平总书记用“三个离不开”进行了高度概括，即“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观念”^[25]。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指出：“虽则中华民族和它所包含的 50 多个民族都称为‘民族’，但在层次上是不同的。而且在现在所承认的 50 多个民族中，很多本身还各自包含更低一层次的‘民族集团’。所以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26]海外侨胞是移居到海外的中华民族成员，从族源认同角度，他们属于华人族群。因此，海外侨胞是中华民族重要成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论不仅表明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结构，同时也是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本质上就是中华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这一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即对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的认同。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特征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并不是同义反

复，它在中华民族属性的基础上突出共同体属性，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共同性和不可分割性，强调中华民族成员之间的共同命运和利益。

一是彰显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27]首先，源于中华大地独特的生态环境。根据文化生态学 and 生态心理学的观点，生态类型影响经济形态，经济形态影响社会结构、性格行为与社会取向。“中原农耕文明最早孕育了成熟的文字和政治制度，最早建立了‘天下’秩序，最早构建了天道民本的政治理念，最早形成了连续不断的历史叙事，最早开创了兼收并蓄的多族群共同体。”^[28]其次，源于中华文明的规约和引导。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肥沃土壤，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滋养中不断发展壮大。中华文明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决定力量，它形塑着中华儿女的主体力量，激励着中华儿女的伟大创造，规约和引导着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铸就了中华民族。最后，源于大一统历史传统的底蕴支撑。在大一统历史传统的影响下，先后形成了华夷一体观（古代）、中华民族观（近现代）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代），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由多元走向一体。

二是彰显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共同体是由有共同性的个体构成，“共同性是共同体的特质和命脉”^[29]。共同性要素主要包括共同的地域、血缘、历史记忆、文化、前途命运等。同时，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则是共同性在思想层面的表现，它是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思想动力，是各民族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强大内生动力，是各民族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维系在一起进而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强大推动力。共同性与个体的共同需求相关，中华民族成员最主要的共同需求，“表现为对中华民族的情感归属、对中华文化的精神认同

以及对中华民族利益的共同追求”^[30]。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共同性是把中华民族塑造成一个有机整体的重要因素，决定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三是彰显中华民族的不可分割性。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情感上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在经济上，各民族互惠互利，相互支持，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文化上，中华文化具有包容性，能够兼收并蓄，百川汇海；在情感上，各民族通过交错杂居、礼仪往来、族际通婚等形式，相互亲近，结成了深厚的民族友谊。各民族与中华民族不可分割。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个大家庭，各民族是家庭成员，是组成部分。各民族的命运和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利益不可分割，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决定着各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最高利益。只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只有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各民族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总之，中华民族本身是一个整体，具有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整体性，不可分割。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8)[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4.
- [2] 中共中央统战部.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G].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807.
- [3] 卢梭.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35.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53.
- [5]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458.
- [6] 鲍曼. 共同体: 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M]. 欧阳景根,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9.
- [7] 卡斯特. 认同的力量[M]. 夏铸九, 黄丽玲,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2-3.
- [8] 郝亚明. 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4): 29.
- [9] 俞可平. 当代西方社群主义及其公益政治学评析[J]. 中国社会科学, 1998(3): 105-121.
- [10] 车文博. 弗洛伊德主义原理选辑[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375.
- [11] 方文. 欧洲社会心理学的成长历程[J]. 心理学报, 2002(6): 653.
- [12] 王延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J]. 民族研究, 2018(1): 5.
- [13][27] 习近平. 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105、284.
- [14] 马歇尔, 吉登斯. 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M]. 郭忠华, 刘训练, 编.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23.
- [15] 马戎. 如何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EB/OL].(2023-11-03).<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FCOan22BmE>.
- [16] 常轶军. 中华民族认同: 三维意涵、结构韧性与政治功能[J]. 思想战线, 2023(4): 83.
- [17] 沈桂萍. 准确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N]. 中国民族报, 2015-03-27(5).
- [18] 陈连开. 中华民族之含义及形成史的分期[J]. 社会科学战线, 1996(4): 146.
- [19]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4-6.
- [20] 周平. 再论中华民族建设[J]. 思想战线, 2016(1): 1.
- [21] 金里卡. 多民族国家中的认同政治[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0(2): 118.
- [22] 傅才武, 严星柔. 论建设2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5): 66.
- [23]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EB/OL].(2021-08-28).<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n1/2021/0828/c1024-32211215.html>.
- [24] 新华社总编室. 治国理政新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活动通讯选(二)[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9: 233.

-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47.
- [26] 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4): 18.
- [27]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 22.
- [28] 严庆.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命脉与民族工作的方向: 增进共同性 [J]. 西北民族研究, 2021(4): 13.
- [29] 陆春梅, 王希恩. 从“共同体”“中华民族”两个视角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 [J]. 广西民族研究, 2024(1): 47.

责任编辑: 赵晓锋

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表达的构成要素、功能及创新实践研究

宝应县委统战部、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课题组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如何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上的统一战线工作,不断开创新时代统战工作新局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必须不断加强统一战线话语表达的创新。统一战线话语表达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承担着思想政治引领、社会整合协调、激励社会大众、文化思想传播等功能。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表达创新集中体现在理念创新、内容创新、载体创新、风格创新等方面。

关键词: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表达;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1]。如何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上的统一战线工作,不断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必须把握做好统战工作的规律,在理念、内容、载体、话语方式等方面不断加强统一战线话语表达的创新,畅通与统一战线成员的联系沟通,为结交挚友诤友、赢得党外人士尊重和认同发挥作用。

一、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表达的构成要素

“话语”一词,由“话”和“语”构成,“话”是指“说”或说出的能表达思想感情的声音及将其记录下来的文字,“语”是指说出的话,即表达思想所用的符号工具^[2]。“话语表达”是指话语主

体和话语对象用来促进彼此交往与沟通,借助各种形式、载体以描述、解释、评价、建构某种信息或内容,并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形成特定影响的动态系统。统一战线话语表达主要是指一种在特定领域内面对特定对象的话语表达。统一战线话语表达由多个要素构成,主要包括话语主体与对象、话语内容与形式、话语语境与载体、话语目标与效果等,这些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统一战线话语表达独特的内部结构并影响统一战线话语表达的创新发展。

(一) 话语的主体与对象

话语主体涉及“谁来说”。话语主体在话语建设方面能否有所作为,将直接影响着话语的感召

收稿日期:2024-05-15

作者简介:执笔人为林祖华,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徐义婷,苏州市相城区漕湖学校教师;姚绍瑜,宝应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姜文明,宝应县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葛家会,宝应县委台办副主任;张娴云,宝应县社会主义学校副校长。

力与影响力。统一战线话语主体是一个多重主体且有特定的层级结构。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统一战线话语生产与实践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协调者，确保各级话语主体在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前提下，能够协调一致地提出符合历史规律、时代要求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战话语理论，并通过主导话语内容、整合话语载体、掌控话语环境、强化话语传播方式等引领统战话语实践朝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前进。

话语对象涉及“向谁说”。确定话语的传播对象十分重要，要根据不同的对象“因人而宜”。在统一战线话语表达建构中，要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受众群体的特点，形成全球化、区域化、分众化的表达，以提高统一战线话语的吸引力、亲和力和影响力。

（二）话语的内容与形式

话语内容涉及“说什么”。当下中国，统一战线话语表达的内容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说清楚统一战线的价值取向与目标追求；说清楚统一战线是在特定性质与结构的社会中，凝聚起各方力量以支持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必然选择，并具有随时代而动、循规律而变的强大生命力；说清楚统一战线各方力量的角色、作用，以及相互间的关系。

话语形式涉及“如何说”。这对确保话语的生机与活力起到重要作用。话语形式多种多样，要以目标为导向，基于所需传达的思想内容，在不同语境下，针对不同受众群体，借助各类载体，选择一种最适宜的话语形式或是有机融合多种话语形式。

（三）话语的语境与载体

话语语境涉及“在何种情况下说”。语境是话语赖以存在的空间，是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使话语得以有效表达、传播，使话语主体与对象得以有效交往、互动的言语场域。话语语境是影响话语权构建的外源性因素。构建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权，必须进一步营造和谐的统战话语语境，

讲好新时代统战故事。

话语载体涉及“借助什么说”，其充当着话语主体、内容、对象之间的连接中介。话语载体如何选择取决于其与话语主题和话语形式的匹配度，话语主题内容不同，所选择的话语载体和形式也应有所区别。话语信息总是要借助一定的物质形式来传递，一般而言，这种物质形式包括电视、报刊、广播、互联网等大众传媒，还包括会议、规章制度、理论学习、学术交流、参观访问、社会实践等多种活动载体、管理载体、文化载体。

（四）话语的目标与效果

话语目标是指“为什么而说”，其为话语表达的生成与发展指明方向并提供动力支持。从总体上看，统一战线话语表达的目标在于对涵盖统一战线性质、内容、意义、特征等在内的统战理论与政策进行准确反映、科学阐释、合理宣介与有效传播；在于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提升统一战线工作的实效性，使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不断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合力。

话语效果涉及“说得如何”，表现为话语对象是否接受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话语主体所传播的信息内容。这取决于话语主体对话语内容的理解及践行程度、话语对象对话语内容的兴趣和赞同程度、话语主体和话语对象是否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等诸多因素。

二、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表达的主要功能

统一战线话语体系既是中国自主知识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增强其话语体系效能、话语自信与影响力的关键构成。统一战线话语表达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承担着思想政治引领、社会整合协调、激励社会大众、文化思想传播等主要功能。

（一）思想政治引领功能

统战工作说到底就是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根本任务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统一战线话语表达具有思想政治引领功能。统一战线话语本质

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产物，其承载着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旗帜鲜明地展示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态度、政治观点和政治思想，其构建和传播的过程亦是不断增强大众对党的创新理论的认知与认同程度的过程。同时，统一战线话语表达能够在同非主流话语的对话和交锋中，增强大众在多元化社会思潮中的判断力和鉴别力，防止敌对或错误的思想观念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冲击。

（二）社会整合协调功能

在现实社会中，不同阶层或社会群体在具体利益诉求上各有不同，不同利益的分化促使社会矛盾的复杂化。在此情形下，统一战线话语表达能够发挥“社会水泥”的作用，引导不同社会成员将思想观念锚定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并着眼共同的长远利益目标，以操作成本较低的对话、协商方式调节具体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使各种利益关系间达成平衡有序、协调一致的状态。同时，不同领域和阶层的社会成员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资源，构建和传播统一战线话语，使其产生引领力、感召力，扩大不同社会成员对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支持的力度与广度，动员、吸纳各类政治资源在统一战线旗帜下致力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

（三）激励社会大众功能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利益为全部政治活动的价值取向，契合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各方“和合”共同创造理想社会与美好生活的心理文化状态。这能够在情感上有效引起大众共鸣，促使他们对涉及统一战线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更加充满信心。伴随着此类正面情感的不断上升与发酵，人们会自觉将统一战线背后的价值追求内化为自身的价值标准，激励自己将实际行动统一到团结联合的大潮中，最终汇聚成实现国家民族理想的磅礴伟力。

（四）文化思想传播功能

一方面，统一战线话语表达既汲取了马克思

主义理论智慧、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又立足于中国政治社会发展实际，有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统一战线话语表达有助于文化在空间维度的传播。从国内看，统一战线话语表达能够借助各类媒介广泛宣传党的思想理论，在整个社会中构筑起一种隐性教育情境，达到以文化人的效果。从国际看，统一战线话语表达能够对外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精神内涵和独特价值，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又积极地推动着中国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走向世界。

三、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表达的创新实践

新时代以来，统一战线话语表达的创新实践主要体现在理念、内容、载体、话语方式等方面。

（一）理念创新

理念创新是话语表达创新的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表达在理念创新上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重要法宝”到“强大法宝”，二是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三是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四是以“共同体意识”融通“中国梦”与“世界梦”。

1. 从“重要法宝”到“强大法宝”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题中应有之义。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相适应，中国共产党立足治理之需，将对统一战线作用和使命任务的认识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3]。党的二十大报告把统一战线由过去的“重要法宝”表述为“强大法宝”，进一步凸显了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地位和作用。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表达向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进一步拓展。

2. 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毫不动摇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发展的历史实践中得出的宝贵经验，新时代统

一战线话语表达因循这一基本经验, 又根据实践发展的新样态深化了对它的认识, 强调“大统战工作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坚持大团结大联合, 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4]。

3. 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解决好人心和力量问题是统一战线的重大战略问题。而凝聚人心和力量的关键就在于处理好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 “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5]。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 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 不断巩固已有共识、推动形成新的共识, 做到增进一致而不强求一律、尊重差异而不扩大分歧、包容多样而不弱化主导, 实现最广泛的大团结大联合。

4. 以“共同体意识”融通“中国梦”与“世界梦”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 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6]。在新时代, 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以凝结着无数中华儿女整体利益和共同企盼的“中国梦”引导各民族、各阶层自我意识与国家整体意志的趋同与协调, 使各民族、各阶层和谐交流、团结奋斗, 增强统一战线的凝聚力、向心力。与此同时,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世界的繁荣也离不开中国。我们追求的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祉, 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 中国梦与世界梦相互依存, 相得益彰。

(二) 内容创新

从内容上看, 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表达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 着眼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 以一系列新表述、新概括、新论断推动各领域工作取得新进展。

1. 强调政党关系“新型”意涵

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表达重点强调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优势, 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 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履行职能”^[7]。

2. 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工作之“纲”

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表达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工作之纲, 将其贯穿到民族工作的各领域、全过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 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8]。

3. 强调“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表达在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基础上, 进一步阐明了宗教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9]。

4. 强调“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表达契合中国社会结构的新变化, 切实聚焦加强对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加强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 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 强化共同奋斗的政治引领”^[10]。

5. 强调“把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表达对团结引领民营经济人士予以高度关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11]。

6. 强调“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 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

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表达以团结联系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 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为基调,助推海外统战和侨务工作开拓新局面。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12]。

(三) 载体创新

新时代,通过充分运用会议、制度、媒体多种载体不断增强了统一战线话语表达的传播效果。

1. 会议载体创新

新时代,在加强统一战线话表达的过程中,注重发挥会议的传播载体作用。例如,2022年7月,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集中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概括为“十二个必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党的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史的智慧结晶,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根本指针,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同时,在国际重要会议、重大论坛上,加强有关统一战线的议题设置,加大对外宣介统一战线的力度。

2. 制度载体创新

新时代,以推进相关制度体系建设推动统一战线话语表达实现更大传播效能。修改党章、宪法中有关统一战线性质和范围的表述,将“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拓展为“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修订印发统一战线领域的基础主干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增进人们对统一战线工作基本要求、方针政策、体制机制、方式方法的认识,“为规范统一战线各界成员思想和行为提供了根本准绳”^[13]。逐步完善涵盖统一战线各具体领域的专项制度,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为统一战线在治国理政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政策依据。

3. 媒体载体创新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网络信息技术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变革,也给统战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对此,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积极适应网络社会的变化,不断增加统战工

作在新媒体空间的发声渠道,推进载体创新,如开设微信公众号、政务微博等新媒体账号,打造出满足统战工作需要、符合网络传播规律的立体化覆盖、多平台叠加的统战话语新媒体宣传矩阵。

(四) 话语方式创新

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表达注重话语方式对话语传播效果的影响,促使话语表达风格更具时代化、中国化、通俗化。

1. 善用时代话语

时代性是语言的生命力所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话语语境和话语系统。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新时代的统一战线话语表达不断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引领时代,彰显时代感,紧跟时代发展变化,努力展现时代风貌。例如,网络语言是当下的一个客观存在,有些网络语言文质兼美,新鲜活泼,大大丰富了我们的表达方式,是语言发展的源头活水。对此,在语言风格上善用巧用体现时代发展的话语,注重采用大众耳熟能详的网络语言讲好中国统战故事,发出新时代统战工作最强音。

2. 善用中国式话语

善用巧用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征的语言对有关统一战线的政治、学术文本进行本土化解读和再造,体现表达语言上的中国特色。例如,用“众人拾柴火焰高”来阐释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用“非一则不能成两,非两则不能致一”来说明统一战线中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强调统一战线是在承认和尊重差异客观存在的基础上,调和差异,使内部诸要素间达到平衡而和谐的状态。通过大量引经据典、援古证今,新时代的统一战线话语表达在坚守民族本色和文化底色、激发民族情感和文化自信中,提升了传播效果。

3. 善用群众话语

“群众话语”是指站在群众立场,用群众的语言讲群众愿意听、听得懂、能接受的话语。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表达在不断“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中实现自身的创新,更多地用人民群众愿

意听、听得懂、记得住的话语来更好宣传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一是善讲“大白话”。例如，把统一战线工作成效的衡量标准表述为，“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交到的朋友多不多、合格不合格、够不够铁”；又如，在强调坚定政党制度自信时提出不要总是觉得“自家的肉不香，人家的菜有味”。二是勤用“贴心话”。善用贴切的比喻令人豁然开朗，例如，用“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来强调加强民族团结。三是善讲“知心话”。用老百姓所熟悉的通俗语言与群众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如用“搭台唱戏”的生活概念来说明新媒体代表性人士的类别。总之，多用群众语言、善用群众语言，把大道理通俗化，增强了统一战线话语表达的成效。

参考文献：

- [1][3][4][6][7][8][9][10][11][1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9、39、39、39-40、39、39-40、40、40、40、40.
- [2] 邱仁富.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论[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25.
- [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3.
- [13] 光雅芹. 新时代统一战线制度建设的实践探索与逻辑理路[J]. 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3)：42.

责任编辑：鲍跃华

基层统战工作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探析

齐春雷

摘要:基层统战工作作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很强的内在关联性,在目标价值、主体力量、推进方式等方面高度契合、相得益彰,从而为二者共融共进、良性互动提供了充分前提和坚实支撑。应将基层统战工作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并与之形成良性互动,强化党建引领,丰富平台载体,完善协同机制,探索数字赋能,在充分发掘统一战线优势效能,助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同时,促进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统一战线;基层治理;社会治理;协商民主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基层统战工作作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处在整个统战工作的前沿阵地^[1],应将基层统战工作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并与之形成良性互动,在充分发掘统一战线优势效能,助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同时,促进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基层统战工作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契合性

基层统战工作与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很强的内在关联,在目标价值、主体力量、推进方式等方面高度契合、相得益彰,从而为二者共融共进、良性互动提供了充分前提和坚实支撑。

(一) 目标价值契合

当前,我国处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

期,内外环境深刻变化,所有制形式更加多样,社会阶层更加多样,思想观念更加多样,亟须广泛凝聚共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维护、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2]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需要统一战线的制度机制保障。统一战线以大团结大联合为本质要求,能够团结联合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阶层的统一战线成员,自

收稿日期:2024-05-20

作者简介:齐春雷,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政党政治、协商民主。

觉接受、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在共同的目标下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调，在坚持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一致性上，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正确处理利益多元、思想多元的多样性，关注广大统一战线成员的诉求，照顾同盟者利益。基层统战工作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巩固已有共识，推动新的共识，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从而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基层治理的现代化。

（二）主体力量契合

基层社会治理要以广大基层群众为治理主体，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激发人民群众创新创造的活力，充分调动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通过党委政府和社会群众的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基层统战是指县及县以下单位，包括乡镇、街道、社区、机关、学校、国有企业、非公有制企业、科研院所和医疗卫生等单位的统战工作^[3]，拥有各领域、各行业丰富的人才、智力、资金，众多基层统一战线成员拥有创业、创新的知识技术、社会资源，是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统一战线求同存异、体谅包容、民主协商的柔性工作方式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在多方多元化治理主体的协调整合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基层统战工作深入群众，联系群众，为群众依法通过多种途径参与地方事务的管理提供制度保障和机制化渠道，为基层治理中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的群众诉求，提供了表达、整合的体制内机制、平台、渠道。通过卓有成效的基层统战工作协调关系，化解矛盾，能够团结最广泛的力量，凝聚最广泛的共识，有效地进行整合、优化配置，充分激发基层治理多元主体的活力，引领群众有序地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形成基层治理的社会多种力量合力，促使基层社会治理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协同共进的良好局面。

（三）推进方式契合

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要求深入推进政府治理变革，由执政党和政府权力主导转为党委政府、社会、市场和群众之间的协商共治，需要广泛吸纳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和广大群众等，使这些治理主体通过制度化渠道合法有序、自觉主动地广泛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和社会治理。对此，协商民主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推进方式。通过党委政府、群众和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民主协商，达成多方治理主体的最大共识，共同应对日益复杂社会环境中的新矛盾、新问题。统一战线为广大基层的统一战线成员参与社会治理、致力于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制度渠道和平台载体。基层统战工作联系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民族宗教界等方方面面的人士，整合、动员、集聚不同群体的社会精英和人才资源，拓展治理主体参与的多元性，促进统一战线成员和各阶层人士有序参与政治、表达利益诉求，凝聚多方共识，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增加助力，减少阻力，聚集合力，引导、发挥其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作用，通过平等交流、民主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智慧，提升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提升基层治理的效能。因此，基层统战工作与基层社会治理高度契合于基层协商民主的地方实践。

二、基层统战工作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广泛凝聚共识。”^[4]新时代新形势下，亟须统一战线更好地挖掘制度优势，积极融入基层社会治理这一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工程。

（一）汇聚多元共治合力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城乡融合的大趋势已不可逆转。随着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胜利，乡镇在基础设施方面已经与城

市实现了一体化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医疗服务得到切实保障，从而为统战资源下沉基层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大量的投资创业沉淀在社区、工业园区等基层一线。新的统战工作对象的“流动性”特征鲜明、职业选择多样、思想观念多元，这需要通过细致深入的统战工作，关注更加广泛多元的基层统一战线成员的需求，将这些分散、流动的力量紧密地凝聚、团结起来，夯实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尽管人们工作、学习的流动性大为增强，但他们日常住所相对固定。因此，开展社区统战工作具有以基层社区为单位的天然平台，有利于各类社会组织、多元社会主体共同打造多元主体协同合作体系。在统一战线领域，党外、体制外的成员数量比较多，但他们为基层社会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的渠道相对较窄。基层统战可为组织、团结、引导他们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平台和渠道；同时，能够充分发挥统战工作的政策优势和方法优势，将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各方面的丰富统战资源和力量紧密联合起来，有效整合起来，使其在地方现代化建设和社会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二）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必然要求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群众诉求不断趋于多元化、多样化，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叠加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影响，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安全风险隐患多发、频发。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突发状况、偶然事件等引发的舆情更容易发酵扩散，对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绝大多数矛盾萌芽于基层、肇始于基层，基层治理处于防范化解矛盾风险隐患、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一线前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紧迫性日益凸显。基层统战工作通过直接联系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工商联、政协委员、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可吸纳统一战线成员广泛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使他们就基层社会各种问题进行民主协商、对话沟通，寻求最大公约数，从而协调利益

关系，化解基层治理中的矛盾。基层统战工作能够将所联系的不同阶层、界别、群体的多样化意愿诉求加以收集、反映；同时，发挥上传下达的桥梁纽带作用和集思广益的智库功能，将基层群众的所想、所盼、所愿、所求反映到党委政府。基层统战工作通过做党外人士这个特殊群体的工作促进政党、民族、宗教、阶层、海内外关系的和谐，有助于统筹安全与发展，防范化解统一战线领域重大风险隐患，从而在良政善治中促进安全与发展相统一，秩序与活力相统一。

（三）促进科学民主决策的必然要求

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使得基层治理所涉及的公共政策决策愈加精细化、复杂化、专业化。虽然党委政府有大量的专业性人才提供专业性咨询，但仍不能穷尽基层治理极其广泛繁琐的方方面面，这需要通过充分吸纳所有利益相关方在决策前和决策过程中开展民主协商，以提升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因此，除吸纳广大群众的参与以外，需更加注重各行业、各领域专业人士的意见建议。统一战线汇集了大量各行业、各领域的专业人才，基层统战工作能够从中组织相关人员发挥自身特长，就基层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进行调查研究的建言献策、民主监督。其中，民主党派成员以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专家学者众多，能够提供更具专业性的意见建议。人民政协作为囊括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以及各界人士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能够组织政协委员就基层治理中的经济社会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从而集思广益，广求善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有较多律师、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等专业人士，他们提出的意见建议往往能够为党委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决策提供参考，使决策更加贴近民生需求，更接地气，更容易为基层广大群众所接受，有助于推动政策顺利落地、产生实效。

三、基层统战工作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

当前，基层统战工作仍是大统战工作格局中

相对薄弱的一环，基层治理现代化给基层统战工作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要在党委集中统一领导下，构建基层统战工作与基层治理现代化互促共融的发展格局，健全相关机制，加强品牌建设，以基层统一战线的发展汇聚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合力，助力基层治理现代化。

（一）强化党建引领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地方党委对本地区统一战线工作负主体责任，各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为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统一战线工作第一责任人^[5]。基层党组织是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的坚强战斗堡垒，强化其统战功能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重要抓手。基层统战工作要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发挥领导核心的引领带动作用。要将基层党建与基层统战工作相融合，坚持党建引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组织轴心作用，发展统一战线，壮大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力量和资源优势，加强基层党委与统一战线领域党外人士以及各界群众的联系与团结合作。传统统战工作更关注统一战线成员中的代表性人物，但新时代统一战线成员人数众多，领域、行业差异性很大，有些人士在各自的专业行业领域虽影响力突出，但“一根头发带动一把头发”的效应并不明显。对此，基层统战工作不能只关注少数个别领军人物，在做好重点人士工作的同时，要结合党的群众工作加强团结引领，不断增强广大统一战线成员的认同感、归属感。应将联系团结广大统一战线成员的工作有机融入基层党建、基层群众工作的整体布局，在“两新组织”“两个全覆盖”工作的推进中，以基层党组织健全的工作体系延伸基层统战工作触角。可在党群服务中心设置对应的统一战线基层服务工作窗口，为统一战线成员和各阶层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一站式统战工作服务，体现统战工作特有的政治性、艺术性、情感性和求同存异、体谅包容、民主协商的方法优势。可依托网格化基层党建，推动落实“网格+统战”的工作模式，将社区统

战工作有机嵌入网格化基层党建管理，切实强化党委对基层统战工作的领导，通过全面落实统战网格员联系制度，发挥网格化引领带动效应。例如，湖北省黄石市推进统战工作进小区、进网格、进楼栋，构建基层统战工作嵌入体系，将各类统一战线成员嵌入“村（社区）党组织、网格（小区）、楼栋、中心户”的基层治理架构，引导统一战线成员依托村庄理事会，搭建阳光议事厅、湾场夜话等群众议事平台，聚焦基层治理、产业发展、乡村文明等工作，开展深入研讨，积极建言献策、献计出力^[6]。2022年以来，各类统一战线成员有效融入网格（小区）议事平台1400多个、楼栋小组2200个，参与板凳会、夜话会、小巷议事会、楼栋协商会、入户宣传等多种形式活动3100余场次^[7]。

（二）丰富平台载体

要在统战工作对象集中的地区，采取多种方式打造基层统战工作的平台阵地，延伸基层统战工作触角，实现基层统战工作的全覆盖。要以激活基层统战资源的动能和效能为工作目标和着力点，强化网络化、社会化、专业化思维，围绕基层社会治理的扶贫惠民、公益服务、交流合作等主题活动，努力打造具有影响力、号召力、特色性的工作品牌，紧密结合基层实际，以社区、校区、园区、街区等作为切入点、结合点和着力点，推进全方位、全领域的基层统战实践，用好、盘活基层丰富的智力资源、人才资源、社会资源，发挥不同领域统一战线成员的特色优势，引导其聚焦基层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建言献策。同时，在组织建设、提供服务、活动开展等方面关注统一战线成员自身的发展成长，从而激活他们的主动性、能动性。在社团统战工作中，新时代各类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大量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党外人士聚集，构成各具特色的朋友圈、工作圈、商务圈、生活圈。分布在新社会组织中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不同的行业领域能够提供不同的专业化社会服务，可基于此打造社会服务特色品牌，在服务社会中展现其价值，拓展

其业务空间，提升其职业荣誉感、事业成就感、个体价值感，增强统战工作的引领力、号召力和凝聚力。加强对社会组织领军人物的团结引导，带动、吸纳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投身于社会服务、公益事业等，在建功立业中激发其潜能和热情。对于代表性人士，要给予他们一定的社会职务或政治身份安排，如推荐担任政协委员等，充分发挥其影响力和号召力。在街道、社区统战工作中，要推进家门口的统战工作、生活圈的统战联系，不断增强社区中统一战线成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升他们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度。例如，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将人流密集的商业街区作为展示统战工作、宣传统战政策的重要载体，选择仙林“万达茂”商业综合体，打造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万达汇”，提供政治学习、交流联谊以及促进合作与发展的统战平台，辐射仙林湖商圈民营企业、商业银行、服务业等领域从业人员2万余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1000余人，成功创建江苏省首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示范基地^[8]。在乡镇街道的统战工作中，可以通过成立新乡贤联谊会（理事会）聚集当地的新乡贤资源，致力于当前的乡村振兴事业，在乡村的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例如，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充分挖掘、发挥新乡贤作用，建立“线上+线下”项目资源对接平台，打造一批示范性新乡贤回归产业园、产业项目，近两年来，项目成就斐然，已落地新乡贤回归项目57个，总投资达到69亿元^[9]。同时，要围绕中心工作，不断完善品牌战略，在创建工作品牌中引导统战工作对象为当地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并充分展现他们的社会责任担当、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三）完善协同机制

基层统战工作要同基层社会治理共同谋划、同频共振，在地方党委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下，健全多方力量参与的统战工作协同机制，将散布于基层的统一战线成员组织起来，加强彼此的联

系、沟通、协调。这要求以网络化的工作体系、联动型的工作机制科学配置资源力量，联系团结引领所在区域、行业的统一战线成员，在体系对接、队伍联合、分类施策上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切实发挥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作用，完善会议协商、日常协作、监督考核等相关机制。要赋予有关行业性社会组织统战功能，并借助行业的党建资源，以品牌联建、活动联办协同推进统战工作。将街道“两新党建”部门作为协同配合的部门，同时依托楼宇、社区、园区的党组织，拓展深化与统一战线成员的团结联系，增强群体的凝聚力和标识度。要以民营企业 and 民营企业家的需求为导向，会同相关职能部门为企业提供办事咨询、政策扶助、社保办理等零距离服务，及时收集企业的诉求，健全日常联络、分类处理、集中研判等各种机制，主动为他们提供服务，助力其提质增效。以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和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导向，依托统一战线的制度机制开展更为科学、民主、公正的基层社会协商治理，创新、完善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基层统战工作要积极推进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建立健全民主党派、社会组织、人民团体等协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民主协商的制度建设，将各阶层党外人士和相关力量动员起来，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特色优势，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更具专业性和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在街道、社区、村组日常的管理中，进一步推进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民主协商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不仅要通过政党协商、人民团体协商等协商民主方式优化有关决策，还应就人民群众所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大力推进基层协商，及时有效地了解、吸纳统一战线成员和广大群众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见建议，凝聚多方思想共识，为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有效破解基层治理难点提供决策参考。要建立完善相关单位参与的统一战线防范化解风险机制、应急防控机制，及时联合排查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风险隐患，会

商研究解决措施，将相关领域的风险消弭于萌芽状态。

（四）探索数字赋能

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赋能基层统战工作的现代化发展，可以实现网上、网下交流与协商的有机结合，进一步拓宽团结联系统一战线成员的阵地，加大统战工作的集约化。基层统战工作将实体空间与虚拟社会相结合，需要线上、线下共同部署、统筹推进、再造模式。要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的特点和优势，建设基层统战工作大数据信息共享系统，搭建统战信息查询平台、参政议政平台、统战事务管理平台、建言献策平台、统战工作宣传平台等信息化平台，集管理、服务、宣传、互动等功能为一体，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组织基层统战相关活动，加强信息处理、数据共享、资源整合，满足统一战线成员线上获取信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建言献策、联谊交友等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要建立基层统一战线成员的数据库并加强管理维护，做到数据及时更新。要运用网络大数据平台多角度、多方面收集、分析统一战线成员的工作动态、意愿诉求，提升统战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做到更加精准化对接、精细化服务。在技术赋能基层统战工作的过程中，可充分发挥基层干部和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在数字建设中的主体作用，集聚党政部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方方面面力量，整合民族宗教、社会主义学院、工商联、侨联、台联等统战系统各单位的信息资源，建立统一的领导指挥协调机制，实现彼此之间统战信息的共享互通，

营造网上、网下齐心协力，“全党共同重视、大家共同来做”良好氛围，形成上下协同、左右联动的工作机制。同时，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安全性，始终把网络安全作为基层统战工作数字建设的底线。严格落实相关保密规定，加强信息化建设的网络安全监管，制定落实各种安全措施以保障在网络“云环境”下的统战数据信息安全、访问安全和隐私安全。

参考文献：

- [1] 肖存良. 让基层统战运转起来：以上海市奉贤区网格化统战为例[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6): 13-20.
- [2]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2022: 30.
- [3] 张志雄. 党建+统战：基层统战工作的路径选择[J].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9(4): 56-59.
- [4]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N]. 人民日报, 2019-11-02(1).
- [5]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21: 6-7.
- [6][7] 俞远汉. 黄石：创新统一战线服务基层社会治理路径[J]. 中国统一战线, 2023(10): 58、59.
- [8] 章晶. “五区共建”健全基层大统战工作格局[J]. 中国统一战线, 2023(4): 54.
- [9]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委统战部. 萧山：统一战线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J]. 中国统一战线, 2023(9): 60.

责任编辑：鲍跃华

论统战文化在文化自信中的独特价值与重要作用

王天海

摘要:人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的世界。文化自信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与世界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统战文化是中国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进程、核心内涵、现实基础和组织形式等维度,对培育和涵养文化自信带来正向效应,具有独特价值与积极作用。

关键词:文化;统战文化;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1]。从文化自信的历史演进、价值导引、时代基础和特有优势等方面看,统战文化客观“在场”并强化文化自信,是文化自信重要的信念来源和底气。就此而言,探究统战文化在文化自信中的特有价值和重要作用就有了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丰富的实践价值。

一、文化、统战文化与文化自信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的世界就是文化的世界。人类有了文化的规定和滋养才能根本区别于动物而具有了历史超越性的存在意义和生存价值。中

国学者张岱年认为:“治国者须观察天文,以明了时序之变化,又须观察人文,使天下之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行为止其所当止。在这里,‘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系,‘以文教化’的思想已十分明确。”^[2]古往今来,人们试图定义文化以更好地理解人类本身和客观世界。研究表明,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宽泛,关于文化的定义有一百多种之多。例如,文化人类学家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3];美国学者巴格比则认为,“文化就是社会成员的内在和外在的行为规则,但是剔除那些在起始时已明显地属于遗传的行为规则”^[4];著名学者亨廷顿强调文化是“一个社会中的价值

收稿日期:2024-05-19

作者简介:王天海,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论文项目“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23JZD02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5]；中国学者胡适和梁漱溟则对文化有着基本一致的判断，认为文化就是人类生活的样法。综合以上分析可见，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凝结成的稳定的精神财富总和，内在规定着人类的生存活动。简单地说，文化是人类的第二自然或活法。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分裂的力量在于，由于文化总是一个国家、民族、群体等具体范围深层的机理性的行为方式，各种文化之间根深蒂固的差异性区隔开受各种文化影响与制约的人群。统一的力量在于，文化整合力能将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超稳定地凝聚在一个行为规范系统中，并且由于文化共性和内在的自由性，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就有了互联互通互鉴互融的可能性。

无论从分裂力量的角度还是从统一力量的角度看，统战文化都内蕴文化的本质要义，既有文化的普遍含义又有统一战线的独特逻辑。统战文化是中国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人在表征统一战线对象化活动的存在方式，也是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意义体系。从狭义上说，统战文化是关于统一战线的心理积淀、价值规范、精神自觉和观念体系。从广义上说，统战文化不仅包含统一战线内部的理念系统，还是统一战线五大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政党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意义集合体。统战文化有文化的共性，但更多体现的是其特性，具有理论性与政策性相统一、开放性与自在性相统一、广泛性与群体性相统一、价值性与功能性相统一、包容性与独有性相统一等特征。从其功能价值的角度来看，统战文化主要是一种以和合为要旨的认同文化，作用在于促进心灵契合、情感交融、国魂陶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统战文化建设集中表现为政治引导，其目的在于使个体的价值观念紧紧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与人民福祉结合在一起，基点在于厚植爱国主义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当代中国，爱国主义

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6]。从其本质意义上说，这是统战文化建设价值归宿和根本任务。

当然，强调统战文化的整合价值和引导功能，并不意味着要无差别地抹消其他各种类型文化以达成主流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唯我独尊”，而是在有原则底线基础上的尊重彼此和求同存异，用各类型文化丰富和拓展主流文化的内在蕴涵，从而体现出文化的创新性与超越性。这才是统战文化具有现实意义并传承发展下来的命脉所在。

既然文化是人的后天的行为规范体系和传承的价值观念体系，是历史凝结成的人的生存样式，那么文化自信就是对历史凝结成的规范和价值体系嵌合现实的生存样式的信心，也是对自身生存方式的充分肯定和坚定的信念，更是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相较于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显性”自信，文化自信的“隐性”特征更具历史厚度、心理深度、内涵广度和存续久度。文化自信具有厚重的历史感，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历史积淀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表述，作为国家和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和现实景观，具有明理慎思的理性、豁达开朗的心态、浩然之气的情感和积极创新的境界，经年累月滋养中华民族，在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和碰撞中，为中华民族铸就傲然于世界文明之林的精神家园。

基于以上分析，统战文化在厚植新时代文化自信中具有独到的价值功能和无可取代的作用。统战文化有利于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有利于找到中国文化的最大公约数，有利于画出文化自信的最大同心圆。统战文化是体现文化自信团结力量、凝聚人心，完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保证；统战文化是延展文化自信协调关系、化异为同，认同中国特有文化价值的有效形式；统战文化是实现文化自信坚守追求、保持独立，挺起民族脊梁的强大力量。

二、文化自信养成要求统战文化的出场

文化自信的养成有赖于明晰中国文化的生成

历史。中国文化历史主要涵盖古代文化、近现代文化和新时代文化。国外学者常称中国为“儒教国家”，这从侧面说明了儒家文化在我国古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伦理为纲，家国同构。儒家思想的伦理又可称为“礼”与“仁”，礼是从衣食住行的规则到日常生活、家庭社会乃至民族国家的秩序，而仁则是礼的价值根源，是遵守礼的心理和文化基础。从家族仪式的礼到社会行为规范的仁，扩展到国家制度性的礼法，这正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要义，就是从家庭出发，以礼为纲，扩展到整个社会等级之间的秩序建构，以仁治国，在仪式中贡献对神灵的尊敬，求得国家内部的团结与稳定，从而完成从家庭到社会最终落脚到国家的家国一体。1840年以来，面对外来冲击，中国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剧烈变革同步，也得以重新阐释，有的已经与古代文化形成“断裂层”，有的还与古代文化“藕断丝连”，有的则被船坚炮利强行输入的西方文明所笼罩，有的则是国人在“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引导下与现代世界文明对接、融合和共通，形成中国特有之文化形式。近代政治变革和救亡图存的运动促成了文化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现代意义上的各类学科以及新的社会风俗习惯等在这个阶段逐渐形成气候，嬗变成当下之文化形式的雏形。

旧中国常常在文化自卑和文化自负两极文化心态中徘徊。一方面，矮化本国传统文化，认为传统文化愚昧落后，乃是前现代性腐朽没落之文化形态；另一方面，拒斥西方文化，认为国家混乱、社会秩序破坏、人民道德缺失，皆是因为西方文明入侵。从文化的发生学角度说，完备意义上的文化形态，是文化内部结构丰富复杂的表现，也是文化发展的必然阶段。文化自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这意味着中国文化由自发自在状态的文化形式转向具有创造力和主体性的自由自觉的文化形态，深深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作为近现代文化和新时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统战文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征程中形成与发展，对养成文化自信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首先，统战文化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统战文化工作者整理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典籍、文物珍品、文化遗址；修复破损的图书馆、博物馆、学校等文化设施；遵循“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原则，整编传统文学艺术作品；对传统医学和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进行必要的整理，为文化自信奠定坚实的传统基石。其次，统战文化广泛吸收了西方优秀文明成果。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证明，社会处于对外开放活跃时期，就是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时期，反之，文化发展则呈现出迟缓或停滞的状态。由此可知，文化自信的提出乃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国力自信的必然结果，代表中国已经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华民族有博大宽广的胸怀，敞开对外开放的大门，营造通畅的对外开放渠道。统战文化主体打破“官方交往”的局限，从更高层次、更广区域、更深领域发展与国外的交流，了解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特色，借鉴吸收对中国文化有益的文化成分，丰富文化蕴含，活跃中国文化的科学技术、文艺舞台、文学创作和体育事业。最后，统战文化助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进程。统战文化工作者通过完善和扩大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科学文化团体，在严格区分意识形态问题和学术观点的前提下，鼓励不同学术观点、不同文学艺术流派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还参与党和政府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创造更加民主的学术交流环境，推动文化自信的具体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这些具体的举措充分体现了统战文化在养成文化自信中的现实意义和特殊价值。

三、统战文化的本质凸显文化自信的精神实质与价值取向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文化是我们身外的东西——它存在于个体之外，而又对个人施加着强大的强制力量。我们并不老是感到文化强制

的力量，这是因为我们通常总是与文化所要求的行为和思维模式保持着一致。然而，当我们真的试图反抗文化强制时，它的力量就会明显地体现出来了。”^[7]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获得自尊心和自主性的重要标志，直接反映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世界吹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站在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影响世界发展潮流中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这种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归根结底还是文化自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内蕴着文化自信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

文化自信的精神内涵丰富深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捕捉到的国家、社会和公民相互关系的文化意识，贯穿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国家、社会和公民三者关系的独特的解释原则和概念框架，熔铸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以观照国家、社会和公民互动关系的价值理念、审美意识和终极关怀。因此，文化自信表征了新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时代精神的文化表征。在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文化最深层次的内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是文化自信最本质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文化海纳百川的博大气象、兼容并包的实践品格与和而不同的独立精神的时代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表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导向对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的支配地位和决定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中国共产党开创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社会正义、法律规范、民主政治和人民民生等各个方面，人民已广泛认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并升华到精神世界，内化成心理上和文化上的形塑，外化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践行。

毛泽东同志说：“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

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8]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是人心和力量问题。”^[9]统一战线与国家稳定、社会和谐和人民安定休戚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统一战线，就没有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功。而在广泛凝聚人心，团结联合各方力量的过程中，统战文化无疑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统战文化的本质属性和把握现实的方式是兼容并蓄与和而不同。兼容不同性质文化的特性，包容异质文化的胸怀是统战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牢牢守住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政治圆心，与各种文化形态取长补短，最大限度画出文化同心圆，构建最大容量的文化共同体，是统战文化的孕育初心和历史使命。在构建文化自信新征程中，统战文化具有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吸纳外来先进科学技术文化成果、提高中华民族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独特的功能和价值。

四、统战文化的意涵映射文化自信的现实基础和时代表达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发展水平总是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应，反映了一定的生产关系。在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了以人工智能和区块链为核心技术的智能革命。其主要特点就是数据正在成为新的驱动力，经过集成的大数据直接应用于国家治理、政府决策以及文化传播，推动了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中国因为人口众多且具有相对较高的人口素质，在这场革命中享有比较优势，并加快把智能技术转化为治理效能，推进经济力量、科技力量和军事力量等硬实力的迅速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化自信软实力植根于国家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并反作用于国家和社会发展，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按下“加速键”。文化自信的生成与加深直接反映了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因此，我们对国家

发展和美好生活的自信深深浸透在各种文化形式中，并且坚韧地凝结和固化下来，不会轻易被改变或颠覆。

不仅如此，长期的文化自信还带来了国民开阔的视野、平和的心态以及广博的智识。从这个角度看，广泛开展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互鉴恰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就世界文化史发展而言，中国文化主要是与西方文化碰撞交集。这个“西方”不仅仅指的是地理方位上的“西方”，更重要指的是意识层面上的“西方”，也即相对于东方文化的“希伯来—希腊—罗马—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这种演进脉络下的西方文化虽然与东方文化不无相通之处，但是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异质文化范式。东西方文化据有世界文化谱系的主要地位，构成世界文化版图的重要两极是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如果人们还在战战兢兢地保卫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只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世界上唯一的解决办法时，文化的比较研究就不能发展，这种人绝不会懂得，获得其他生活方式的知识会增加对自身文化的热爱。”^[10]延伸开来，在面对不同文化时，正确的态度是充分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既不“俯视”也不“仰视”世界各类型文化，而是“平视”他者文化，与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世界文化增进了解，共存共荣，推动人类文化共同体的繁荣发展。

平等对待各类型文化并与其取长补短，共同探索人类更加美好的文化生活，是统战文化与文化自信相耦合的重要特征。文化自信不是孤立的和静止的，而是具体的和现实的，要将文化自信贯穿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中，贯穿到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继承发展中，贯穿到对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借鉴吸收中，从而更好地发展立足本国、面向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文化支撑的社会主义文化。要想实现这样的宏伟目标，就必须大力推进统战文化建设，因为统战文化是搭建各国间文化沟通的重要枢纽，也是融合国内各领域文化的主要方式，

其“包括以团结合作、民主协商为鲜明特点的政党文化，以爱国进步、团结和睦为鲜明特点的民族文化，以护国利民、崇和向善为鲜明特点的宗教文化，以明礼守信、义利兼顾为鲜明特点的新的社会阶层信义文化，以同宗同源、念祖爱乡为鲜明特点的海内外同胞同根文化，等等”^[11]。从国际角度看，数量巨大的海外同胞特别是华侨、归侨、侨眷深受多种文化影响，要充分发掘他们的中华文化底蕴，想方设法增强他们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同，促使他们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鼓励他们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文化故事，为住在国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树立大国侨民良好文明形象。从国内角度看，政党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新的社会阶层信义文化以及港澳台同胞同根文化构成统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政党文化内涵而言，“五一口号”发布后民主党派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自身在政治生活中的优势，形成了以合作共事、为民参政、民主协商、政治监督等为核心内容的政党文化。在内蕴丰富的政党文化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大力加强自身文化建设，并以自身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带动所代表的那部分群体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培育宗教文化的目标而言，就是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构建积极健康宗教关系，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新的社会阶层信义文化而言，广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弄潮人，用锐意进取、艰苦奋斗、严谨务实、精益求精、敬业敬职、敢于担当、勇于负责的文化精神内核引导自身发展，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正能量、作出新贡献。就港澳台同胞同根文化特色而言，广大香港、澳门和台湾同胞在祖国日益强大的影响下，逐步增强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同心同向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近代以来中华儿女的最伟大梦想。由此，统战文化的丰厚内涵深刻昭示文化自信的现实根基，代表了一种以最广大人民的全面发展

为旨归的文化观，谱写了中华文化高度自信的时代篇章。

五、统战文化的组织彰显文化自信的特有形式与独特优势

著名人类学家蓝德曼指出：“文化创造比我们迄今为止所相信的有更加广阔和更加深刻的内涵。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正如我们历史地所探究的，没有自然的人，甚至最早的人也是生存于文化之中。”^[12]同样，文化自信从来不是超然于物质生活、精神世界的奇思妙想或空洞的文化口号和吁求，而是在思维中把握到的文化确证，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力量的强大信心，确信中国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必将辉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昔日荣光焕发出新时代的生机与活力，为世界文明贡献中国文化智慧、中国文化力量、中国文化发展方案。这种文化自信不是“文化霸权”或“普世文化价值”，也不是中国封建文化或各种狭隘文化之当代再现，而是文化本身对以往一切文化形式的批判性反思，对当下世界文化发展的整体性把握、建设性重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性引导。

文化自信作为人类自我意识形态之一，深层地取决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现实状况，并通过一定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文化自信的建构不是苍白的运动式口号，而要在鼓励、引导各方代表人士和民众参与提升文化自觉和文化正能量的文化事务中得到具体体现。这种文化参与感赋予人民以文化效能感和文化信心，制度化的参与还可以持续增强人民的文化体制自觉，将民众带入日常文化生活，以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导性文化精神。

统战文化组织在塑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征程中具备得天独厚、无可比拟的优势和地位。我国统战文化组织具有坚实的文化底蕴支撑，形成了完备的组织形式，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实践经验，具有稳固的文化制度基础，

牢牢扎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繁荣兴盛的历史阶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我国特有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各界爱国人士为基础组成的，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对联系、团结广大党外知识分子、各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海内外侨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广大党外知识分子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很多都是文化领域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士，甚至不乏文化领域的大家。这些文化精英是构建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13]。此外，我国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少数民族独具风情的文化形态为我国文化建设增光添彩，像石榴籽一样紧密黏着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增加了别样的风采。同时，宗教文化坚持宗教中国化正确方向，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认同基础，着力使宗教思想和信仰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引导广大宗教徒爱国守法、服务社会，造福人民。在对外文化交流领域，宗教文化也为推广中华民族文化，增进世界各国与地区文化间的交流互通发挥独特作用。统战文化组织的具体形式多种多样，许多民主党派成员或民间文化团体，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文化娱乐活动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如举办著名书画家的个人作品展、书法讲座等。一些少数民族文化团体和宗教组织也通过参与文化建设为构建文化自信夯实基础，如“民族风情展”“少数民族运动会”的兴办，这些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增进了文化共识，提升了人民的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43.
- [2] 张岱年, 方克立. 中国文化概论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2.
- [3] 庄锡昌. 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99-100.
- [4] 巴格比. 文化: 历史的投影 [M]. 夏克, 李天纲, 陈江岚,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99-100.
- [5] 亨廷顿, 哈里森.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M]. 程克雄,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3.
- [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334.
- [7] 恩伯 C, 恩伯 M. 文化的变异 [M]. 杜彬彬, 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37.
- [8]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06.
- [9]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556.
- [10] 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 [M]. 吕万和, 熊达云, 王智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11.
- [11] 江苏省委统战部, 江苏省泰州市委统战部. 新时代统战文化建设研究 [J]. 中国统一战线, 2024(4): 24-26.
- [12] 蓝德曼. 哲学人类学 [M]. 彭富春, 译. 北京: 工人出版社, 1988: 260-261.
- [13] 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41.

责任编辑: 宋好

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价值与路径研究

李 婕

摘 要:党中央指出反腐败要标本兼治,既要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又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对于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不断实现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战略目标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从价值意蕴、理论溯源和实践路径三个维度来阐述新时代加强廉洁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关键词:廉洁文化; 价值意蕴; 理论溯源; 实践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明显增强,全党全社会廉洁价值理念进一步树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标本兼治,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1]。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对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符合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诉求。

一、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价值意蕴

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对于推进党的自我净化、弘扬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增强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一) 有利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作为坚持和完善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内容。加强廉洁文化建设,追求的最终目标是战略意义上的“不想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关于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体现了党中央对廉洁文化建设的深刻思考和科学认识。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能够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举措。

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清正廉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标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要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就必须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可以充分发挥文化“以文化人”的作用,使廉洁奉公、崇廉尚俭的思想深入人心,将

收稿日期:2024-05-18

作者简介:李婕,如皋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公职人员心理健康与调适。

反腐败关口前移,达到反腐败治本的效果。新时代廉洁文化作为党内政治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集中体现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助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支撑。

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推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内在动力。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新时代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有助于党员干部坚守初心使命,统一思想、意志、行动,具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保持奋发有为的干事创业精神,有助于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只有推动廉洁文化建设实起来、强起来,才能助力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不断增强党员干部廉洁从政、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的思想自觉。

(二) 有利于涵养全社会清正廉洁的价值理念

近年来,在我国一些领域腐败文化侵蚀了少数党员干部,毒害了一些普通群众。这种“文化”倡导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力寻租等价值观念,败坏了社会风气。在其持续浸染下,人们对于腐败的道德羞耻感降低,一时的心理冲动会逐渐演变为一种习惯,甚至演化成为一种心理需求和生活方式。腐败文化一旦蔓延,将会影响多数人,辐射多领域,并将通过代际传递作用在未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指出:“如果先进的廉政文化不去占领文化阵地、营造社会氛围,腐败文化就会乘虚而入、污染社会、搞坏党风政风。”^[2]只有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用先进的廉洁文化培育风清气正的廉洁理念,才能净化社会风气,让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的主流价值观得到推崇和遵循,推动社会发展向上向善。

(三) 有利于提升个人清心养廉的文化自觉

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每个领导干部都应该慎独慎微,从小事小节上加强自身修养,从一点一滴中

完善自己^[3]。共产党人更应该在廉洁自律上作出表率。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把自律看作做人、做事、做官的基础和根本。《论语》中提出,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古人所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第一位的。对个人而言,修身的内容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不断自我反省。反躬自省是“修身之本”,是破除“心中之贼”的终极思想武器。二是约束不合理的言行。严以修身就是要战胜自己的不良想法、不良欲望,只有心怀敬畏之心,时刻警醒,才能做到自我净化、洁身自好。

二、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理论溯源

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廉洁文化思想、中华传统廉洁文化、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廉洁文化观的赓续创新,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

(一) 源于马克思主义廉洁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廉洁理论的阐述是党推进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廉洁政治观是社会主义廉洁政治建设的思想根基、理论源泉。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这本书中分析了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一系列措施。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提出了反腐倡廉的重要思想。他认为,无产阶级国家应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廉洁机关^[4],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例如,严把入党关,清除不合格的党员,提高党员质量,保持党的纯洁性;积极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防止脱离群众的危险;改革党和国家机关,加强对权力机关和党员干部的检查和监督;加强法制建设,防止国家公职人员腐化堕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廉洁文化”的概念,但他们对反对官僚主义、加强权力约束、反腐倡廉等理论的阐述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二) 源于中华传统廉洁文化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廉

洁文化是在中国社会与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大夫臧文仲提出了如何从自我完善的角度来破解“兴勃亡忽”的千古命题。这也是古人最早关于廉洁与王朝兴亡周期率关系的深入思考。从秦朝到清朝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时期，封建专制制度进一步加强，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纷繁复杂，但廉洁文化依然是封建统治者倡导和褒扬的主流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当中“八德”里两个德目“孝”与“廉”之间就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传统的孝德中规定：孝顺不仅指养父母之身，还包括养父母之心、父母之志。作为官员，养父母之心还包括忠于职守、清廉公正等方面的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孝和廉紧密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孝廉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制度反腐层面对廉洁文化有很深的影响。从官吏选拔方式上看，古代的选官制度主要经历了世袭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四个阶段。官吏选拔制度的改进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任人唯亲的弊端，更加注重考察官员的勤廉德绩能的综合素质。从监察监督制度上看，从秦朝开始，中央就设御史大夫主管监察。中国历史上监察制衡主要表现在监察官对行政官权力的制衡、中央对地方的权力制衡、皇权对官僚权力的制衡、监察官之间权力的相互制衡四个方面。这些权力间的相互制衡，对于巩固中央集权、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法律制度上看，我国反腐倡廉的法律制度建设起步早，内容细致完善。秦朝时就有了中国第一部廉政法规《秦律》。到了唐朝，廉政法规进一步完善，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法典《唐律疏议》对惩治贪赃枉法、腐败渎职就有了详细的法律规定，对受贿者、行贿者、受贿枉法者有了专门的惩处措施。之后的《大明律》《大清律》在沿袭《唐律》的基础上对官吏贪污犯罪的种类及惩罚标准的规定更加具体详细。中国古代形成的“德法并举”的廉政制度，为惩腐肃贪、澄清吏治奠定了制度基础。

（三）源于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理论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始终把清正廉洁作为必备的政治品格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我们的经济政策》《关于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等文章中，逐渐探索了加强党的廉政建设的基本思想，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使命任务和所处的客观环境制定了相应的廉洁制度和措施，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关于反贪污浪费指示》等文件，逐渐构筑起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廉洁文化思想。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从党的宗旨和人民政权的性质出发，严格要求各级人民政权及其工作人员廉洁奉公，坚决反对贪污和浪费。从当时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倡勤俭建国，厉行节约。从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出发，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要永远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段时期，党内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坚决反对官僚主义，积极开展反腐败斗争，有效遏制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贪污腐化现象，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始终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坚持反腐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段时期，党内开展了整党运动，在思想、作风、组织、纪律方面取得了进步。明确提出三位一体、标本兼治的反腐败斗争方略，提出了“廉政文化建设”的概念，出台了《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廉政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把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作为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一项战略举措^[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形势下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

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这段时期，党从思想、文化、道德、制度等不同维度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新理念，并正式提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概念，出台了《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开创了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三、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并从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注重家庭家教家风、营造崇廉拒腐良好风尚三个方面对如何实施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作出了明确的要求。

（一）开展党性教育，厚植廉洁思想根基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是充盈思想、凝聚信念的重要核心。

一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在行动实践上维护党中央权威、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思想是理想信念得以深深扎根的地方，若不及时清扫、维护，便会蒙尘。党员领导干部要不断打扫思想中的灰尘、清除思想上的杂质，同一切侵蚀思想的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作斗争。做好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工作，必须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构筑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二要提升道德修养。提升道德修养，对于党员干部来说，最突出的道德就是政德。古人云：政德兴则政权安，政德衰则政权乱。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从政之基。党员干部的政德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形成了以“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核心的新时代政德观。认真学习和领悟新时代的政德观，

对于净化政治生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要加强党纪党规教育。党纪是管党治党的“戒尺”，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召开的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强调：“如果把党章和党规党纪学好了、掌握了，又自觉遵守了，防患于未然，就可以防止一些干部今天是‘好干部’、明天是‘阶下囚’的现象。”^[6]在全党开展的党纪学习教育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搞清楚党的纪律规矩是什么，弄明白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把遵规守纪刻印在心，内化为言行准则^[7]。

（二）加强家风建设，助推社会风清气正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既是家事，也是国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家庭、家教、家风与党风、政风、社风的内在关系，对于推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是家庭要加强品德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家庭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品德教育，就是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作为父母和长辈，应该把正确的道德观念从小就传递给子女，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促进其健康成长，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二是领导干部要引领家风教育。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重家教、守家训、正家风的文化传统。历代王朝都将“严以治家”视为官员“廉洁从政”的重要前提。历代清官廉吏也多以传承良好家风家训而闻名于世。领导干部带头加强家风建设，就是要从历代清官廉吏的良好家风中汲取智慧，将“立公去私、严以治家”内化为“廉洁齐家”的从政品质，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为全社会做表率。

三是全社会要加强家国情怀教育。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起源于家

风的涵养、家教的养成，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厚植爱国情怀，可以引导和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增强对国家的热爱，对社会的责任和对国家的担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三）宣传廉洁理念，培养廉洁社会风尚

廉洁教育能引导社会成员树立公正、法治、爱国、诚信、友善等正向价值观，增强人们法规意识和纪律意识，提高道德修养和廉洁涵养，自觉抵制腐败行为，助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

一是积极宣传廉洁典型。“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党员干部学习榜样，目的是将榜样力量转化为工作奋斗的生动实践。各地区各单位可以注重发现身边的勤廉典型，大力宣传勤政为民、廉洁奉公事迹，让党员、干部学有榜样、行有示范、赶有目标。

二是强化警示震慑。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当人们受到惩罚的时候，会有一种消极的情绪体验，而人们又不希望重复这种体验，从而抑制被惩罚的行为。通过反面案例对有关人员进行教育，正是发挥惩罚的替代性学习作用，给受教育者带来强大的灵魂冲击，产生巨大的内在警醒力量，达到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的效果。

三是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主体是党员领导干部、公职人员，通过他们的引领，在全社会形成廉荣贪耻的新风尚，将廉洁观念深入全体公民心中并自觉转化成行

动，才是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实践中，各地区各单位可以结合本地特征、行业特征，充分利用本地资源，找准切入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廉洁文化活动，营造廉洁氛围。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69
- [2][3] 习近平.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450、440.
- [4] 列宁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87-588.
- [5] 中国反腐倡廉发展史：第六卷[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228.
- [6] 习近平. 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2016-05-01).<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501/c64094-28317481.html>.
- [7]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 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EB/OL].(2024-04-07).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4/content_6943824.htm.

责任编辑：鲍跃华

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圩、堤古村落的保护与利用

——以宿迁为例

丁璐璐

摘要:做好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工作,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民心工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圩、堤式村落是苏北黄泛地区最为普遍的聚落形式。本文结合文物考古与地方文史资料,在调查的基础上,对圩、堤特色价值作了较为详细的解读,同时针对宿迁新型城镇化建设发现的问题,就如何做好圩、堤式村落的保护与利用提出对策。

关键词:传统村落;圩堤式遗址;保护;利用

从20世纪80年代起,对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进入21世纪,新型城镇化建设快速发展,传统村落被蚕食、解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对此国家有关部门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加强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至2023年,我国已有8155个村落分6批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其中江苏仅有79个。江苏根据本省的情况,先后公布了7批江苏传统村落名录,共计554个,宿迁有13个。在宿迁地区传统村落中圩、堤居住遗址最具地域特色。加强对圩、堤古村落的保护和利用对于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圩、堤村落特色价值解读

(一) 历史发展悠久

宿迁人类居住环境有圩沟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新石器时代早期。2010年,经南京博物院考古发掘,在泗洪顺山集发现了距今8000多年的环壕村落遗址。环壕平面形状近椭圆形,东西长约230米、南北长约350米、周长近1000米。鉴于该环壕是整个淮河下游发现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环壕遗迹,故被学术界誉为“天下第一壕”^[1]。2018年,宿迁市博物馆在沭阳桑墟吕台遗址,勘探发现西周至汉魏时期的环壕遗迹,南北宽115米、东西长140米、周长约500米^[2]。此外,在宿迁的秦汉下相城遗址、汉代凌城遗址、东晋宿预故城遗址以及泗洪古汴河畔的隋唐马胡城遗址的四周外围都发现有壕沟遗迹。这种防御性建筑形式,在传统村落的营造格局中以圩沟(塘)的形式继承下来,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收稿日期:2024-03-04

作者简介:丁璐璐,宿迁市宿城区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二）聚落规模庞大

在宿迁境内，冠以“某圩”或“圩子”的地名可谓是星罗棋布。根据同治年间《宿迁县志》记录，以当时境内集镇为中心，就分布了 88 个圩寨。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当地民政部门通过地名普查，发现境内尚有 185 个自然村落和生产大队以“圩子”作为地名^[3]。这些庞大的村落体系，基本反映了宿迁在黄泛地区营建村落的主要形式，为我们研究苏北地区的传统村落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另一类堤坝式传统村落也是宿迁境内分布较广的民居形式，这些村落的地名都带有堡、营、浅、坝、台、堤、埝、湾、口、闸等字义，这和宿迁境内的古黄河、中运河、六塘河、民便河等水系工程建设相关，先民们依堤而居、以水相伴。

（三）建筑风格独特

圩寨村落多数在水位较低的平原地带建造，圩子的大小与形状因村而异，一般面积在 5 万至 10 万平方米之间。在宿迁境内多数以圆形与椭圆形为主，也有连环形与花瓣形的，还有在两条河道之间建堤中圩的，有的较大村落还修筑大小双重圩等。圩沟宽度一般在 15 米左右，深 3 至 5 米。圩塘除有防御功能外，还为村民的生活带来便利。村民将开挖圩沟的泥土用来垫宅筑围，以防水患。身份越高的人家，宅基就垫得越高越大。村舍格局一般坐北朝南，前后排列有序，多数呈井字形布局。村内四巷通达，主要通道连接圩门，犹如世外桃源。堤埝类村落呈线形分布，选择交通要道与河口津渡等节点安营扎寨，堤上堤下错落有致。这类传统村落自然环境优越，视野开阔。在宿迁市湖滨新区皂河七堡村与龙岗村一带，古黄河、京杭大运河、骆马湖隔堤相望，生态环境与居住环境风光宜人，传统的民居房屋布局合理，保存得也较好。从宿迁已入选的双河、仲楼、刘圩庄、林苗圃、李口八堡、新袁堆上组、新袁三岔、爱园梨园、临河云渡、龙集尚咀、天岗湖西马庄、王官集唐圩、卢集郝桥 13 处江苏传统村落看，其

中有 8 处属于圩、堤型古村落，它们具有浓郁的水乡风貌。

（四）经历战火洗礼

圩寨是村民们安身立命的居所，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圩子主要起到抗击外来侵扰的作用。宿迁从清末至民国时期，匪患四起。在官方的支持下，各地都在村落周围开挖圩子，修筑圩墙，还在四隅建起瞭望台与炮楼。兵匪来袭时，附近小村的亲友都会躲进圩寨避难。在黄河故道数县交界地区，匪患尤为猖獗。沿线圩子多以“义”字取名，如义勇、崇义、聚义、仗义、信义、忠义、义合、义保等；还有取保全、保安、集生、守望、一心等圩名，这些圩名都体现了乡民们同仇敌忾，不畏强暴，见义勇为的抗匪精神。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宿迁地区的圩寨也经历了战火的洗礼。最具代表性的是 1946 年 12 月，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与国民党第六十九师在侍岭乡吴圩村展开“人和圩围歼战”，敌军师长戴之奇自杀毙命^[4]。陈毅军长闻讯后欣然写下：“敌到运河曲，聚歼夫何疑？试看峰山下，埋了戴之奇！”^[5]当时戴之奇的指挥部就设在圩内一家姓吴地主的宅院里。这些烽火岁月的动人故事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红色的印记。

（五）传承宗亲文化

村落是以农业生产者为主的定居场所，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一个或几个家族的根据地。笔者查阅宿迁圩、堤村落遗址，发现村名往往多以族姓定名，如张圩、陈圩、陆圩、王圩、李圩、唐圩、卓圩、刘圩、苗圩、戚圩、吴圩、牛刘圩、周李圩、张朱圩、董坝、高埝、宋埝、赵埝、盛老堤、刘口、阎口、魏口、王家营、叶家营、卢营，等等。这些村寨建置的时间多为明清时期，大部分延续至今。例如，皂河镇古黄河北岸的王营村，据江苏省宿迁市皂河镇王营村的《王氏族谱》记载，自明永乐间，始太祖全靖公以武功授邳州卫镇抚职，嗣后三世祖王用以功升指挥使，世代袭爵，直河太潢堤北葬三至八世祖墓茔。其后数百

年王氏后裔一直耕耘于此。从民族学研究角度来看,村落是人类生产、生活、居住和进行各种活动的场所,体现为聚族群体性和血缘延续性特质,是血缘关系、亲缘关系与地缘关系高度重合的社会单元,在民族团结与国家振兴中发挥巨大作用。

(六) 见证运河发展

宿迁是京杭大运河沿线重要城市之一,千百年来,境内的漕运航道多次变迁。元朝至明末,以选择自然的黄河故道“借黄行运”。明万历年间起,为避黄河淤塞与凶险,开始实行“避黄行运”,在宿迁皂河西开挖直河(现在的阎河),北接邳州的泇河,史称“泇运河”。清初先后开挖了皂河、支河、中河等,形成了现在京杭大运河宿迁段,又称“中运河”,全长112公里。在治理黄河故道与开挖人工运河中,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修筑了绵延千里的河防堤坝。在宿迁境内可记载堤坝的村落很多,主要分布在直河故道、中运河航道、六塘河与古黄河两岸。明清时期,宿迁的直河比较密集且保持传统村落风貌的,有阎集村、高埝村、王营村、八井村、朱海村、牛角淹、月堤湖、龙岗村、七堡村、支口镇、九龙湾、洋河滩、车路口、古城山等,这些村落保存着丰富的河工遗存与活态的非遗文化。

二、传统村落保护策略

圩、堤式传统村落是苏北地区具有浓郁色彩的聚落群体。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存在不少问题,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尝试解决。

(一) 明确传统村落认定标准

江苏省在遵照中国传统村落认定标准的同时,结合本省实际出台了《江苏省传统村落保护办法》,明确省级传统村落的认定标准为符合选址与布局、历史建筑与传统建筑、重要历史遗存、传统技艺与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5个条件之一即可^[6]。对比国家层面的认定条件,江苏省更加强传统资源的“代表性、独特性或区域影响力”。前文提到的圩、堤式村落符合认定标准,其历史禀赋与价值取向也具有可持续性。只要我们掌握

了传统村落的认定标准,在充分挖掘其传统与特色方面,就能避免“身在宝山不识宝”的尴尬局面,让更多、更好、更有地域文化的传统村落入选保护名录。

(二) 增强传统村落保护意识

江苏各地在传统村落普查工作上收效还不够显著,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村落保护意义缺乏认识。一些地方把选报传统村落名录看成一种经济负担,认为会给新农村建设带来麻烦,在申报工作上往往避重就轻,浮于表面,导致大量有保存价值的传统村落得不到有效保护。例如,宿迁市宿豫区大运河左堤的车路口村是一处具有地标性的传统村落,它位于中运河与六塘河之间,周边分布有顺河大营、四草坝、宿迁船闸遗址、永济桥遗址等重要古迹。历史上是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乾隆六次“南巡”,每次由顺河大营至永济桥视察河务都驻跸于此,而此处重要的传统村落并未得到有效保护。

(三) 持续做好传统村落调查工作

深入持续地开展田野调查工作,是我们做好传统村落保护最为关键的基础性工作。调查方法可以借鉴文物普查与考古调查工作经验。除查阅地方志与地名普查资料外,还要征访本地区的历史、水利、民政、考古等方面专家的意见。每到一处古村落,都要认真细致地勘察四周环境,召开群众座谈会,了解村情村史。对选址和格局是否具有传统特色、民居建筑风貌是否完整、有无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等,作出客观真实的评估和记录。

(四) 健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制度

在国家和省相关政策基础上,市县政府部门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完善的工作制度,以促进古村落的保护工作。例如,建立市县两级传统村落普查档案制度,将每处传统村落的调查资料分单元收集起来,建立一套完整的遗产清册。又如,建立市县两级传统村落评审制度,在分类分级申报中,除组织相关部门的专家学者到现场

认定外，还要广泛地征求当地群众意见。

三、传统村落利用策略

近年来，针对如何做好传统村落开发利用问题，许多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改善民居、美化环境、开发旅游、健全法规、血缘乡愁、非遗文化等议题上。传统村落作为具有多重价值内涵的活态文化遗产，由于地理环境、村落类型、级别特质等因素的差异，在实际操作中应该依己所长，因地制宜。

（一）圩寨式村落的开发利用

宿迁圩寨式村落分布广泛，且多数保存较好，但在乡镇规划建设中得到开发利用的村落很少，没有很好地打开局面。已开发的比较成功的范例有宿城区唐圩村与刘圩村两处。这两处村落在保持原有的格局风貌上，注重圩塘与花木美化，合理安排菜田植物栽培，打造农家田园风光，增添乡村水韵色彩；对老圩里的村舍改造实行翻建、改建、插建，对老圩以外的民居实行扩建与新建，更加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对圩寨保留的古井、古树、牌坊石刻、土地庙石刻与农耕石刻等，都进行重点保护与展示；在圩区内增设民俗体验区与村史乡情陈列室，让广大村民更好地接受传统文化教育。这些经验值得其他村落学习推广。此外，可以在深入普查的基础上，对所有的圩寨式村落进行评比，按照国家与省级的认定条件，分为优、中、劣三等，把优等村落列入重点保护与开发项目。例如，宿城区龙河镇乱庄圩就是一处优等的圩寨村落，两条圩沟形似并蒂的寿桃，把东西二圩紧密串联，东西长约 500 米，南北宽约 300 米，周长约 1600 米。此处多姓组成的大村落保存完整，四周绿水环绕，圩内至今保存古井 4 口，值得加以开发。

（二）堤寨式村落的开发利用

苏北地区堤寨式村落一般都借助于国家大型水利工程，把房屋建造在大堤之上。宿迁境内主要集中在古黄河、直河、中运河、六塘河等沿线的堤坝台地，以古黄河缕堤与遥堤村落分布最为

密集。这些村落自然环境优越，视野开阔，因为河流冲击，形成高差起伏的地貌，地层以砂质泥土为主，便于蔬菜与花果的培植。宿迁近年来开发利用的代表性的堤寨式村落有宿城区蔡集邓庄村、宿豫区双河里和林苗圃、泗阳李口的八堡村和新袁三岔村等。这些村落在改善现代民居生活环境的同时，又大力发展花圃果园等产业，营造了一处处融观赏采摘、娱乐休闲为一体的种植基地。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运河风光带与古黄河风光带建设中，应该加强对沿线重要节点古村落的保护与利用。例如，宿迁支口镇至皂河镇两河夹缝地带，是堤坝农庄比较密集的地段，河工遗存与民俗文化尤为丰厚，对研究中运河的历史变迁具有活化石的作用。自黄河侵泗以来，宿迁境内留下了许多黄泛缺口，形成了一处处宽阔的湖塘水域，黄水退却后，人们又在近水的高滩地上新建村庄，世代在此耕作生息，这种传统的“理水思想”与“风水观念”造就了大批高滩式村落。自 2021 年起，宿迁在宿城区西片古黄河沿线进行生态旅游及水环境修复工程，将朱海、牛角淹、月堤湖等景区串联起来，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这是城区开发旅游资源所取得的较成功范例。但在规划建设中，有许多以水相伴的民居被拆迁，改变了原有的人文风貌，失去了原有炊烟袅绕、鸡犬相闻的农庄氛围。因此，在项目规划中，应该多兼顾民生民俗发展与传统文化保护，对主要的堤坝村落应予保留，维护村落周边环境的原有风貌。

参考文献：

- [1] 江苏省政协文史委，江苏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政协宿迁市委员会. 江苏文明之根：顺山集文化 [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21：65.
- [2] 宿迁市博物馆，宿迁市文物研究所. 江苏沭阳吕台遗址考古勘探和试掘简报 [J]. 东南文化，2019(5)：32.
- [3] 王晓风. 从地名研究的角度谈宿迁传统村落保护 [J]. 宿

- 迁历史文化研究, 2020(12): 53-54.
- [4] 王立新. 宿豫文史资料选编: 第一卷 [G].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8): 171.
- [5] 张亚东. 沐浴党史光辉·追忆宿北大战 [N]. 宿迁日报, 2021-05-30(2).
- [6] 江苏省传统村落保护办法 [EB/OL].(2017-09-30).http://www.jiangsu.gov.cn/art/2017/9/30/art_46143_6092170.html.

责任编辑: 宋好

国内民营经济研究 20 年：现状、热点与趋势

——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黄若洲 何建宁

摘要: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本研究以 CNKI 为数据源，运用 CiteSpace 文献计量软件对国内 20 年的民营经济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国内研究整体呈现阶段性起伏特征，相关研究机构虽已初具规模，但相互之间缺乏合作交流；研究主题集中在民营经济发展道路、发展现状和发展动力 3 个方面；未来研究热点将会集中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未来研究应注重在坚持党的领导、探索新质生产力、为民营经济发展“赋权”等方面进行拓展。

关键词:民营经济；文献计量；CiteSpace；中国式现代化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1]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已迈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高质量做好做大经济总量“蛋糕”，合理公平地分配、分足“蛋糕”，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民营经济是做大“蛋糕”的参与者，也是“蛋糕”做大的分享者，发挥民营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任重道远而又意义重大。回顾已有文献，国内学者立足多角

度对民营经济进行多维度研究，研究主题宽泛，研究成果丰富。然而，经济的发展与政策环境和理论指导具有“共时性”^[2]。鉴于此，本研究借助 CiteSpace 软件，科学、客观地梳理过去 20 年“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核心文献中有关民营经济的研究，运用科学文献计量学方法绘制发文数量年度分布、研究机构分析和高被引文献可视化图谱，采用关键词共现、聚类 and 突变词分析来剖析总结民营经济研究热点主题，系统呈现民营经济研究的整体发展现状与趋势，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学界与时俱进深化民营经济研究奠定

收稿日期:2024-04-19

作者简介:黄若洲，西安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何建宁，西安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本研究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融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教学研究”（23JDSZK09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基础。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民营经济”概念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后才逐渐在各种官方文件中大量出现^[3]，此后学界对其展开研究，但是高质量成果总体数量有限且视域相对集中。因此，本研究选择 2003 年至 2023 年的 20 年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同时，为提高样本研究文献质量和数据信度效度，本研究选择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收录的 CSSCI 期刊（含扩展版）作为样本研究文献唯一来源。检索时，以“民营经济”为篇名，时间跨度为 2003 年至 2023 年，检索条件设为“精确”。通过高级检索共获得高质量文献 670 篇，为了减少分析误差，手动去除了重复文献、书评、会议综述和发言等。依据下载量选择排名前 500 的期刊论文作为本研究的数据样本。

(二) 研究方法

Citespace 软件主要用于科学文献数据挖掘和可视化分析。运用该分析软件，通过科学文献计量法可以揭示特定研究领域某一主题的整体研究现状，并以可视化知识图谱直观呈现相关信息和信息实体间的相互关联，对了解该领域研究热点和未知领域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4]。

二、国内民营经济研究的总体分析

Citespace 可用于某一主题多种基本信息的情况分析，基于更加直观地呈现国内关于民营经济研究现状的需要，本研究选取文献年际变化、研究机构、共被引文献分析来展现国内民营经济整体研究概况。

(一) 文献发表数量与年度分布分析

文献发表数量的年际变化图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特定研究领域某一主题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基本态势。统计 CNKI 数据库 CSSCI 期刊下载量排名前 500 的期刊论文，依据年份绘制发文数量柱状图（见图 1）。

由图 1 可知，20 年间国内民营经济研究呈现阶段性起伏特征。根据年度发量和波动趋势，可以分为 4 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03 年至 2005 年，国内民营经济研究处于高速爆发期。这主要得益于民营经济刚刚走进人们的视野，学界对此关注度比较高，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前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着更高的期待。尤其是 2002 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5]，这使得民营经济的研究达到了高峰。第二阶段为 2006 年至 2012 年，民营经济的研究发展平稳推进。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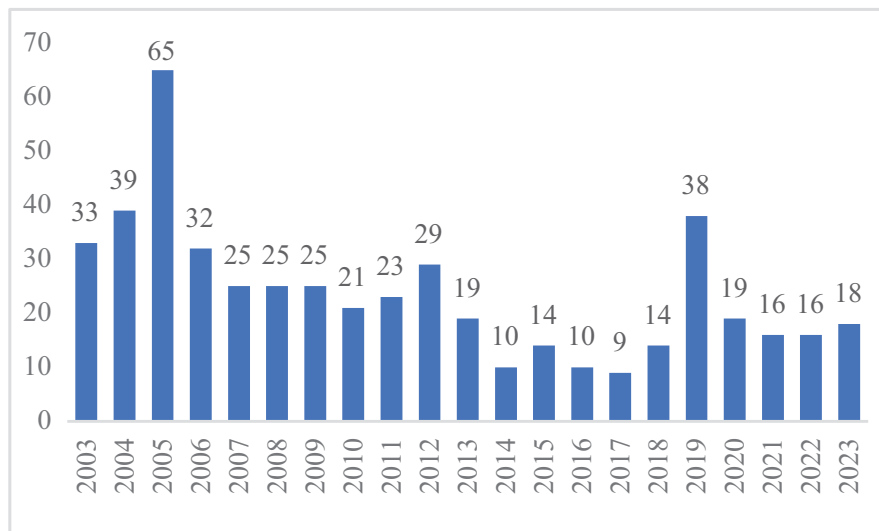


图 1 国内民营经济研究年发文量分布

一阶段民营经济研究态势总体平稳且数量居高，与这一时期国家先后出台多项与民营经济相关的政策有关。例如，2006 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非公有制经济”^[6]。相关文件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不仅如此，2008 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对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冲击，也引起学界对其发展前景的担忧和关注。第三阶段为 2013 年至 2019 年，民营经济的研究总体放缓，只是在 2019 年小创新高。这主要是 2018 年为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学界纷纷撰文回顾总结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的伟大历程，使得民营经济的研究成果小有突破。第四阶段为 2020 年至 2023 年，民营经济研究又进入新的平稳发展期。

(二) 研究机构发文与合作分析

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研究机构进行可视化分析，旨在了解对民营经济的研究是否已具有规模化或形成稳定研究态势。结果显示，研究机构

节点 (N) 共 207 个，连接线 (E) 共 36 条，网络密度 (Density) 为 0.0017 (见图 2)。由图 2 可知，我国关于民营经济的研究机构数量较多，但众多研究机构之间关系并不紧密，只有少量研究机构之间有节点连线，说明彼此之间的合作研究较少，绝大多数机构还处于独立研究状态，且没有对这一问题形成长期稳定的研究方向。可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强各大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是很有必要的，形成对民营经济的稳定研究态势也势在必行。

(三) 共被引文献

高频共被引文献通常是指在某一研究领域中认同度较高、被学者们广为引用的文献。高频共被引文献能够反映该文献选题的开创性和观点的权威性，有利于“形成被引聚类，聚类文献之间研究方向、研究主题关系密切，从而形成代表文章知识基础的知识域”^[7]。

通过梳理中国知网 20 年间关于民营经济研究的高频共被引文献发现，共被引频次在 100 次以上的文献有 6 篇，共被引频次在 50 次至 100 次之间的文献有 10 篇 (见表 1)。其中，姚先国教授的《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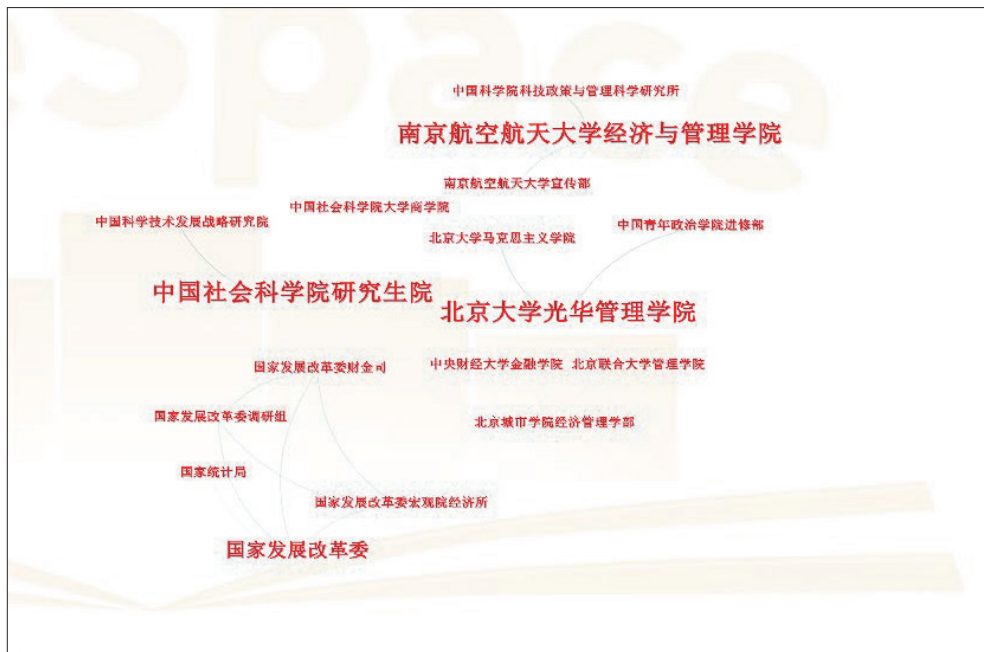


图 2 研究机构分析

表1 国内民营经济研究前16位高被引文献

序号	作者	文章标题	被引频次	发表时间	期刊名
1	姚先国	民营经济发展与劳资关系调整	234	2005年3月15日	浙江社会科学
2	王劲松 史晋川 李应春	中国民营经济的产业结构演进——兼论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外资经济的竞争关系	155	2005年10月20日	管理世界
3	邓宏图	转轨期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以民营经济的演化过程为例	132	2004年9月10日	中国社会科学
4	程俊杰	制度变迁、企业家精神与民营经济发展	126	2016年8月15日	经济管理
5	刘现伟 文丰安	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难点与策略	117	2018年9月15日	改革
6	邢志平 靳来群	政府干预的金融资源错配效应研究——以中国国有经济部门与民营经济部门为例的分析	102	2016年4月15日	上海经济研究
7	童有好	营造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环境的若干问题及对策	77	2019年4月10日	经济纵横
8	王海兵 杨蕙馨	中国民营经济改革与发展40年：回顾与展望	76	2018年3月19日	经济与管理研究
9	丁任重 孙根紧	新时期我国民营经济的转型与发展	72	2011年12月16日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10	杨天宇	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研究	70	2003年12月30日	改革
11	胡大立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与民营经济发展差距的相关性分析	68	2006年2月28日	上海经济研究
12	余力 孙碧澄	民营经济发展的融资困境研究——基于金融抑制视角	61	2013年8月1日	财经科学
13	郭敬生	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价值、遵循、机遇和路径	57	2019年2月1日	经济问题
14	史亚洲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营商环境问题研究	53	2019年9月15日	人文杂志
15	洪功翔 顾青青 董梅生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生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中国2000—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	53	2018年9月9日	政治经济学评论
16	刘大洪 邱隽思	推动民营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改进研究	52	2019年3月10日	法学论坛

营经济发展与劳资关系调整》共被引234次，为20年间最高被引文献。该论文描述了劳资关系的基本态势，阐述了劳资纠纷的若干特点，分析了劳资冲突产生的内在机理^[8]。该文是较早从劳动者、资本等经济要素探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文章，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提出了建议，同时也体现了民营经济发展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因此受到广泛关注。被引次数第二的文献为王劲松、史晋川和李应春发表的《中国民营经济的产业结构演进——兼论民营经济与国有经

济、外资经济的竞争关系》，该研究对民营经济的产业结构、与国有经济的比较优势进行分析。同时，从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和市场、政策壁垒等经济要素入手分析民营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强调民营经济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主要动力^[9]。其他被引次数高的文献也大多是从制度、资金、环境、政府作用和企业文化、发展趋势等要素探讨民营经济的发展困境、机遇和路径。少数学者如洪功翔、顾青青等基于面板数据对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共生关系进行实证

分析,认为二者基于市场规模效应、优势互补效应、相互竞争效应以及分工合作效应等,可以形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10]。总体来看,现有研究文献定性研究多、定量分析少;早期研究关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较多,后期研究聚焦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较多。

三、国内民营经济的研究热点与主题分析

为揭示民营经济领域研究热点,本研究对 2003 年至 2023 年的民营经济研究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得到民营经济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见图 3)。不难发现,高质量发展、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

企业主体、国有经济、共同富裕、环境、制度、企业文化等关键词排名靠前。再结合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 4)和文献内容,本研究认为国内关于民营经济研究的热点主题主要集中在民营经济发展的经济要素、发展道路、经济性质等领域。

为进一步提高民营经济研究热点与主题分析的准确度,本研究使用 BDP 软件对 CNKI 中 500 篇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生成“词云图”,确认民营经济的研究热点词集中在发展路径、制度、环境、创新、共生、企业主体、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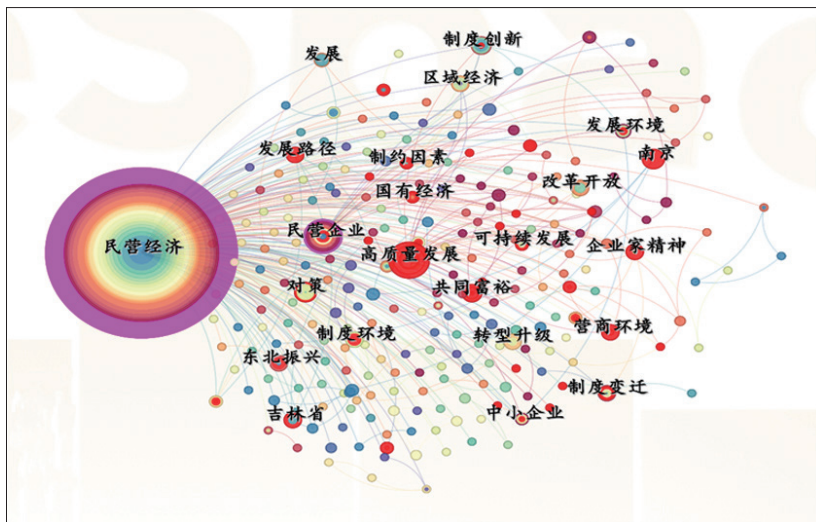


图 3 关键词共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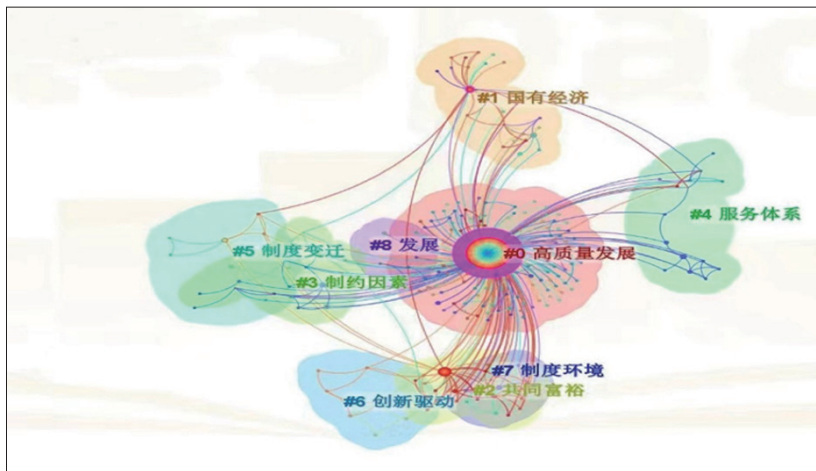


图 4 关键词聚类图

条件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19]。

（二）发展现状

由于外部环境，如制度、资本、市场准入、地方政府作用，以及历史文化等宏观因素的影响，民营经济在不同区域呈现不同的发展模式，在不同时代呈现不同的发展特征。国内文献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对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的比较分析、民营经济发展现存的困境、不足与影响因素，以及民营经济的发展机遇与优势等方面。

在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的比较分析中，有学者总结二者的发展历程，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为共生发展的关系，两者互为对方发展的条件^[20]。有学者认为二者的差异体现在，政策上平等，但在实际经营中，民营经济受太多限制，难以享受平等的权利待遇和竞争机会^[21]；还有学者认为二者在权责利关系上有明确之分，在激励和约束机制上有强弱之分，在对市场的反应和应变的速度上有快慢之别^[22]；在发展环境上，有学者认为国有经济存在垄断经营和不公平竞争^[23]。对于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的相处之道，有研究者从宏观角度提出，二者不仅是共同发展的关系，而且还应该是共生发展的关系^[24]；还有部分学者在中观上，运用 VAR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解释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生发展的机理^[25]；也有学者从微观角度出发，认为二者需要不断实现生产要素交叉融合，持续打造利益共同体^[26]。

民营经济发展现存的困境、不足与外部制约和内部因素密切相关。从外在制约因素来看，有学者认为民营企业的外部环境仍不宽松，在人文环境、政策环境、法律环境和政务环境上仍存在诸多发展障碍^[27]。从民营经济内部上来说，有学者认为国内大多数民营企业产权结构欠佳、管理方式落后和产品处于低层次^[28]。

围绕民营经济的发展机遇与优势条件，学界一致认同始终如一的政策支持是民营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在

党的坚强领导下，根据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不断创新民营经济发展政策理论，有效保障了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29]；也有学者认为，配套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也在不断改善和发展，为民营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政治保障^[30]。

（三）发展动力

针对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推动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学者们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动力展开研究，寻找不同的切入点。有学者提出“外部动力观”，认为政府治理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支持、引导和鼓励的重要作用^[31]；也有学者认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始于改革开放战略的全面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思想的解放、理论的创新以及政策的落实，是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并且屡创佳绩的重要前提^[32]；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宏观政策对民营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33]，体制创新是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根本前提和主要动力^[34]。从内生动力来看，有学者从企业家角度提出，树立正确的企业家精神，为民营经济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坚定的基础，可以形成良好的发展循环模式^[35]；也有学者从创新视角提出，民营经济的动力和创造力的发挥，依托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以及创新人才的培养^[36]；还有学者提出企业要在吸纳人才、拓宽融资渠道、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企业文化和“互联网+”方面进行大力创新，为自己拓宽新的发展渠道，赢得新的发展机遇^[37]。还有学者从专业结构视角认为转型升级是民营经济科学发展的必由途径^[38]。

四、民营经济研究的演化趋势

关键词突变分析可以识别国内民营经济研究的阶段性热点主题，进而分析不同时间段内的研究热点以及预判未来的研究方向。使用 CiteSpace 软件对关键词的突变情况进行分析，得到国内民营经济研究的演进与热点（见表 2）。

经分析共得出 25 个突变词及其起止时间，由表 2 可知，25 个突变词中已有 20 个停止突变，

表2 国内民营经济研究突变词表

关键词	关键词出现年份	关键词突变强度	关键词突变起始年份	关键词突变结束年份	2003年—2023年
制度环境	2003	1.62	2003	2004	
制度创新	2003	1.26	2003	2004	
南京	2004	3.59	2004	2005	
产业集聚	2004	1.53	2004	2005	
中小企业	2004	1.16	2004	2005	
发展环境	2005	1.69	2005	2006	
发展路径	2006	2.17	2006	2008	
中部崛起	2006	1.18	2006	2007	
发展战略	2006	1.18	2006	2007	
发展水平	2007	1.11	2007	2008	
发展模式	2010	1.69	2010	2012	
制约因素	2006	1.64	2011	2012	
吉林省	2006	1.12	2013	2014	
包容性增长	2015	1.28	2015	2016	
可持续发展	2010	1.13	2015	2016	
创新驱动	2016	1.66	2016	2019	
企业家精神	2011	1.52	2016	2019	
东北振兴	2005	1.21	2016	201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18	1.10	2018	2020	
高质量发展	2019	10.50	2019	2023	
营商环境	2019	2.73	2019	2021	
国有经济	2003	1.27	2020	2023	
共同富裕	2014	3.20	2021	2023	
促进型立法	2021	1.21	2021	2023	
内在要素	2021	1.11	2021	2023	

说明其目前已经不是民营经济研究的热点主题。而仍有5个突变词（高质量发展、国有经济、共同富裕、促进型立法和内在要素）的出现时间接近当前时间，并且至今仍未终止突变。这5个突

变词的研究将可能是未来民营经济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前沿问题。

由表2可知，高质量发展以10.50的突变程度位居第一，这说明高质量发展是学界所追逐的

焦点,是现阶段民营经济研究最热门的主题,仍有很大的研究潜力。围绕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研究者从多角度进行了分析与讨论。在国家层面上,有学者认为面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应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抓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推进民营经济转型升级^[39]。同时,在民营企业自身方面,有研究者认为实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国家提供制度保障和价值引领,而且需要民营企业通过自身努力来转型升级和调整布局,两者共同为民营经济充分发展、健康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外部条件并激发内部动力^[40]。

在 5 个突变词中,共同富裕是突变程度第二的突变词,其构成了民营经济研究的价值导向。关于二者的早期研究是论证二者间是否有统一的发展逻辑。有学者认为民营经济与共同富裕的逻辑是统一的,只有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才能在社会化大生产中重建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才能建立起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实现效率的同时达到公平,走向共同富裕^[41]。而后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必要前提和必由之路。在民营经济具有巨大体量、就业人数占据多数的形势下,设法引导和激励民营经济积极支持共同富裕,具有历史必然性^[42]。学界认为二者可以实现良性互动^[43]。

国有经济、促进型立法和内在要素是民营经济研究的兼顾重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国情下,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共生发展,未来仍是学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有学者认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协同发展要以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更要充分发挥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44]。在民营经济发展的立法支持上,研究者认为我国民营经济立法的功能呈现出由“认可型”到“管理型”再到“促进型”的规律性变迁^[45]。内在要素则构成了对民营经济

地位新认识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民营经济社会地位和属性予以科学而清晰的界定:“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46]基于此,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的民营经济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47]。

五、总结与展望

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发现,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以及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与空间的变化,都直接影响学界关于民营经济的研究取向与关注点。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对民营经济的关注多,但厘清民营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的成果有限。从外部因素分析民营经济发展的成果多,但从企业自身内在因素分析的成果有限。从具体因素分析多,但以系统思维对各要素共同推动作用的分析有限。对传统因素,尤其是硬件要素分析得多,但对“新质”要素关注较少。在未来对民营经济的研究中,“如何以中国式现代化规划民营经济发展的路径,赋予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将成为学界亟须回答的时代课题。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虽然成为民营经济的研究热点,但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系统研究。2023 年 12 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如何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转化为民营经济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新动能、如何以新质生产力引导民营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如何统筹安全与发展、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等尚未成为研究的焦点。总之,民营经济研究的时代性仍不突出,很多学者研究了民营经济,但缺乏时代性,或者研究具有时代性,却没有涵盖民营经济的研究对象。结合国内民营经济研究的演化趋势,立足当前研究不足,未来国内民营经济的研究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深化。

首先,加强民营经济党建引领的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其内在

的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的本质运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必须充分发挥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优势。”^[48]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加强党建引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总结民营经济几十年来蓬勃发展和取得丰硕成果的成功经验，确保民营经济走再远的路，都不能忘记来时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否则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犯颠覆性错误。”^[49]民营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民营经济”一词本身就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背景下发展壮大。党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坚强领导，既是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征。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应将民营经济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又以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让民营经济的发展始终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鲜明底色。民营经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市场主体，加强民营经济党建引领研究，可以为民营经济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提供决策参考。

其次，加强对民营经济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提升民营经济科技创新意识，提高民营经济核心竞争力，保持民营经济的经营发展与党和政府决策保持一致。新质生产力的“新”离不开创新，这与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密切相关的。通过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催生出新技术、新动能、新产业，以新技术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以新动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以新产业带动经济发展新模式。学术界应强化研究的时效性，紧随社会热点，加强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进一步探索新质生产力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所起到的更高层次、更深内

涵的作用。

最后，加强民营经济“赋权”研究。所谓“赋权”，就是要求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平权”发展，要求不同所有制和所有制的实现形式都应该有与之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条件、环境、机会，以实现它们在不同领域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民营经济需要在共同富裕中的“赋权”。权利与义务总是相伴随的，在民营经济“平权”发展的基础上，应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程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民营经济是做大“蛋糕”的参与者，也是“蛋糕”做大的分享者，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应引导民营企业走共享发展道路，处理好企业与全社会之间的生产与交换关系，实现全社会范围的合作共赢。因此，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程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参与。在“赋权”和“平权”之后，更应注意“限权”。“限权”就是要规范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既要规范民营企业家，也要规范党政领导干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既让民营企业家更好地认同“自己人”角色身份，培养企业家精神，也能培养“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的干部队伍，进而使民营经济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更好地发挥其在高质量发展中的主体作用。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N]. 人民日报, 2023-07-20(1).
- [2] 郗戈, 荣鑫. 重新理解“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为中心的分析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5(1): 89-97.
- [3] 王磊. 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 [D].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9: 2.
- [4] 胡春阳, 刘秉镰, 廖信林.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研究热点及前沿动态——基于 CiteSpace 可视化知识图谱的分析 [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5): 98-109.

- [5]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 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548.
- [6]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N]. 人民日报, 2006-10-19(1).
- [7] 于杨, 金玥. 《情报科学》的文献计量研究: 热点主题与知识基础 [J]. 情报科学, 2019 (9): 126-132.
- [8] 姚先国. 民营经济发展与劳资关系调整 [J]. 浙江社会科学, 2005(2): 78-86.
- [9] 王劲松, 史晋川, 李应春. 中国民营经济的产业结构演进——兼论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外资经济的竞争关系 [J]. 管理世界, 2005(10): 82-93.
- [10] 洪功翔, 顾青青, 董梅生.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生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中国 2000—2015 年省级面板数据 [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8(5): 68-100.
- [11] 冯留建. 中国共产党民营经济改革的百年历程与历史启示 [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3): 5-13.
- [12] 陈兴发. 民营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兼容性 [J]. 特区经济, 2007(10): 106-108.
- [13] 刘凝霜, 程霖. 中国共产党民营经济政策演变及其理论创新: 1921—2021 [J]. 改革, 2021(1): 36-49.
- [14] 石颖, 张慧. 推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研究——以江苏为例 [J]. 当代经济管理, 2024(3): 38-45.
- [15] 周文, 白倩. 民营经济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 [J]. 社会科学, 2023(6): 1-11.
- [16] 张笑颖. 民营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J]. 商场现代化, 2023(21): 113-115.
- [17] 杨小勇, 余乾申. 新时代共同富裕实现与民营经济发展协同研究 [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2(1): 3-15.
- [18] 陈健. 我国民营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难点及其化解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4): 62-72.
- [19] 吴文新, 张芮昕. 新时代引导民营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实践思考 [J]. 管理学刊, 2023(1): 1-15.
- [20] 汪立鑫, 左川.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共生发展关系——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J].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4): 159-168.
- [21] 冒佩华, 杨浩宇. 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进路 [J]. 上海经济研究, 2023(6): 29-40.
- [22] 李政. 中国国有经济 70 年: 历史、逻辑与经验 [J]. 社会科学辑刊, 2020(1): 11-18.
- [23] 郑红亮. 浅谈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机制差异和功能互补 [J].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02(5): 43-45.
- [24] 汪立鑫.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已进入共生发展关系 [J]. 政治经济学报, 2019(2): 96-103.
- [25] 洪阳, 兰传春, 洪功翔.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生发展的市场规模效应研究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2(2): 101-112.
- [26] 杨瑞龙. 构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协调发展的微观基础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3(6): 4-12.
- [27] 吴正海. 西安民营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及路径探析 [J]. 开发研究, 2014(2): 144-148.
- [28] 雷亮, 葛芳. 对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现状与问题的实证分析 [J]. 开发研究, 2005(1): 23-25.
- [29] 覃凌燕. 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与启示 [J]. 青海金融, 2019(12): 22-27.
- [30] 林昌华. 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与战略导向探究 [J]. 山东社会科学, 2022(6): 117-123.
- [31] 魏小雨, 赵磊. 以法治化治理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J]. 决策科学, 2023(1): 49-59.
- [32] 李双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探索 [J]. 上海经济研究, 2023(7): 53-63.
- [33] 郑修敏, 许晓明. 政策引导还是自我发展?——新中国六十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动力探究 [J]. 社会科学战线, 2009(9): 22-27.
- [34] 高燕. 山西民营经济发展的贡献及其动力机制研究 [J]. 经济师, 2020(9): 137-139.
- [35] 冯小茫. 企业家精神对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J]. 现代商业, 2019(19): 19-20.
- [36] 王一鸣. 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N]. 光明日报, 2018-11-13(11).
- [37] 刘兴灿. 经济新常态下民营经济创新发展浅析 [J].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7(4): 92-96.

- [38] 白小虎. 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制度障碍与破解对策——以浙江温州为例 [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15(1): 67-73.
- [39] 朱鹏华.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挑战与路径 [J]. 理论视野, 2023(4): 45-51.
- [40] 周文, 司婧雯. 民营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 [J]. 财经问题研究, 2022(10): 3-12.
- [41] 魏杰, 施戍杰. 民营经济与共同富裕的逻辑统一 [J]. 经济问题探索, 2014(6): 1-8.
- [42] 吴文新, 张芮昕. 新时代引导民营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实践思考 [J]. 管理学报, 2023(1): 1-15.
- [43] 杨小勇, 闫慧慧. 促进新时代共同富裕实现与民营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研究 [J]. 中国经济问题, 2023(2): 23-37.
- [44] 江剑平, 葛晨晓, 朱雪纯.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协同发展的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J]. 西部论坛, 2020(2): 34-44.
- [45] 张琳. 营商环境视域下民营经济立法功能变迁 [J]. 地方立法研究, 2021(5): 52-65.
- [46] 习近平.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8-11-02(2).
- [47] 彭宏伟. 论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 [J]. 理论视野, 2021(2): 43-48.
- [48] 习近平. 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 [J]. 东南学术, 2001(4): 26-38.
- [49] 习近平.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J]. 先锋, 2023(6): 5-6.

责任编辑: 蒋建忠

探索省域现代化的中国经验与时代价值

——评《省域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基于京沪苏浙鲁粤六省市的分析》

刘志彪

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了在国家层面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本质要求与基本特征，为我们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科学概念铸就了思想理论基础。现在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过去人们普遍认为，现代化一般都是在国家层面上追求的目标，作为空间尺度较小的省域现代化问题，是不是可以成立或存在？如果可以，那么它与国家现代化有何联系与区别？省域现代化有何特点？推进的进程从何入手？有哪些现实的案例、实在的推进战略与有效的举措？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各地发展水平差距很大。经过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东部一些发达省份积累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实力，很多指标早已越过初步现代化的基本阈值。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在省域层面的落实和体现，一些发达省域不止在经济上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在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往往也具有先行优势。这些发达省域的现代化探索与经验，对引领与激活中国其他区域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值得我们去回顾、提炼和总结。基于此，由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王树华、孟静、查婷俊三位青年学者撰写的《省域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基于京沪苏浙鲁粤六省市的分析》一书，以省域现代化为主题，对东部发达省市现代化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综观全书，作者遵循“理论建构→内容解构→实践探索→路径分析”的研究脉络顺次展开。在“理论建构”部分，作者从现代化的相关理论出发，对省域现代化理论进行总结和归纳，并从实践角度对不同国家、不同行政层级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and 具体路径进行详细梳理和系统总结，为本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内容解构”部分，作者将省域现代化解构为“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六个子系统，并对每个子系统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内涵刻画及动力探源。在该书的“实践探索”部分，作者以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六个发达省市为样本，通过对六省市现代化的发展基础与特征、发展历程与实践进行深入分析和深刻总结，归纳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有益经验。在该书的“路径分析”部分，

收稿日期：2024-05-07

作者简介：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常务院长、教授。

作者基于现代化发展的共性规律与东部发达省市现代化先行的现实基础，全面深入地探讨了东部发达省市现代化先行的可行路径，既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也对其他地区的现代化实践提供借鉴参考。因此，无论是从研究视角的切入还是研究内容的把握上，该书都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对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的分析，该书具有如下突出特点。

第一，从合适的空间尺度研究我国区域现代化的发展问题。省域是我国现代化区域率先推进最适宜的空间尺度。该书认为，省域在空间范围上具有相对稳定性、在发展决策上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在要素流动和信息交换上具有较强的内部联系性。以上三个特征使得省域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适度集权”的功能和“承上启下”的作用，成为最适宜区域整体推进的空间尺度。

第二，从多领域、多目标、多向度研究省域现代化的内涵和重点。该书把省域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概括为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六个层面。具体而言，经济现代化要求经济发展方式向创新、高端、绿色转型；政治现代化要以推进省域民主法治建设和行政体制改革为核心；文化现代化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及、科学文化素质提升、审美素质提升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进步为标志；社会现代化要以人为本，通

过省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合理协调社会利益，进而激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生态现代化要以生态保护技术研发、多元主体利益协调、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等作为研究重点；人的现代化在省域层面与国家层面的内涵具有一致性，强调人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客体建设”和“主体受益”双重属性与功能。

第三，从先行示范和引领带动角度研究发达省市现代化的实践探索。通过对六个发达省市的现代化实践探索进行梳理和总结，作者得出了可供其他省市借鉴的做法经验：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打造总部经济、建设规范化的市场机制、夯实实体经济的发展基础、创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人文精神和政策环境、注重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等是推动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在政治现代化方面，推进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的现代化以及基层治理改革是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手段；在社会现代化方面，民生建设、教育改革等是重点领域；在文化现代化方面，教育改革、精神文明建设等是核心内容；在生态现代化方面，促进绿色转型、产业绿色化等是主要途径；在人的现代化方面，推动民生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等是最终旨归。

通览全书，该书逻辑严密、内容丰富、观点鲜明，是一部在省域现代化理论研究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探索上具有重要学术和实践价值的著作。

责任编辑：吉强

论人的本质及其现实性：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

谢 震 王法森

摘 要: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看法既有一定的内在贯通性,又有明显的理论上的区隔和本质性差别。基于感性知觉之于人的本质的确立,形成了两者共同的理论基础。对自然性和社会性的不同侧重,决定了两者不同的理论进路和逻辑结论。马克思借由现实的人的对象性活动(现实的改造世界的活动)对私有制和私有财产所导致的异化予以扬弃,从而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是基于对人类社会或者说历史发展本身作整体把握的辩证逻辑。现实的历史的逻辑已然表明,共产主义历史阶段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也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

关键词:人的本质; 社会关系; 私有财产; 异化; 共产主义

“人的本质”问题在费尔巴哈和早期的马克思的文本中都有过集中论述。尤其是,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全部看法都根源于早期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即使马克思在上述文本中指出,要避免将人的本质看作抽象的、一般的东西,我们也很难不犯将人的本质作一般性理解的人道主义错误。在阿尔都塞看来,青年马克思的许多“著名说法都是直接受到费尔巴哈的启发或者直接从他那里借用来的。马克思的理想‘人道

主义’的各种提法是费尔巴哈的提法”^[1]。基于阿尔都塞的观点,一方面,我们须深刻认识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思想具有明显的“费尔巴哈烙印”,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须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的思想嬗变过程中把握马克思见解的生成性和独创性,并在此基础上理解人的本质及其现实性。

一、人对其自身的关系：非人本质的消解

无论是基督教中的神还是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都体现着精神世界对现实世界的统治,即一种从人的头脑中抽离出来的思想观念约束着个人道德、品性,致使人的本质在现实层面被取

收稿日期:2024-02-26

作者简介:谢震,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王法森,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城市生活发展思想与当代价值研究”(SC21C086)、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2023年基层共建共治共享专项课题“共享资源创造视角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SHZLZX23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消了。这种思想的统治延伸到日常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但并没有适当地引导现实中的人追求更高的发展，相反抑制了个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马克思揭示了这种思想的统治的实质——“迄今为止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标准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不受他们支配。他们这些创造者屈从于自己的造物”^[2]。

本质是内在于个体的人的共性的东西。那个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虚假观念（神）被设定为人的本质，它具有对人的一切规定并支配着现实中的人。在过去的西方哲学家的头脑中，它是无限的、神圣的。费尔巴哈在《宗教的本质》中认为，“神圣的原始实体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一切事物，也是由于它具有万物的特性，而它的这些特性却高出一切，无边无限”^[3]。在虚假的意识中，本由“类”之共性构成的人的本质蕴含在一个原始实体之中，而这个原始实体又以宗教的形式虚幻地表现出来。虽然我们对宗教的认识愈是充分，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愈是深刻——“宗教中的每一进步，都是更深入的自我认识”^[4]，但是在这种不断的自我认识中，人们往往会感到自卑、无力、有限。因为，即使我们意识到“确定和表示神与人或个人之间的差异的那些特性，从根本上来说，只不过是自然的特性”^[5]，而自然的统治对于人来说仍然是最高表象。人在自然面前表现出有限性、依赖性，难以通过自身的、现实的力量成为完善的人。在这个过程中，非人的本质被上升为最高的力。人们有意无意地将人的本质对象化为看起来非人的东西，即抽象出一个存在于人之外的无限的实体。但那非人的本质被赋予的不过是人的一切特性。在宗教中，本属于人的三位一体的思维、意志和爱，反过来作为属神的、绝对的权力支配着人们。人虽对三位一体的力量进行追求，但将那力量归于既不属于人、也非人所创造的本质。不过，费尔巴哈指出，当人通过思维、

意志和爱去战胜自己、征服一切时所爆发的力量（在费尔巴哈那里，并非单独一个人的力量，而是人作为类所共有的力量），人的本质便从中实现。费尔巴哈实际上取消了人的本质出于神这样一个规定，进而破除了人们头脑中的虚假观念，根本上颠倒了神与人的关系。

借助对宗教的批判，费尔巴哈进一步将人的本质的现实性建立在人所特有的感性知觉基础上。费尔巴哈在《宗教的本质》中指出，“对于一个抽象的、仅仅有思想的实体，光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并没有眼睛，也没有一点温暖，因为它并没有感觉，对于它，根本就没有什么世界，因为它并没有器官来感受世界”，“世界之呈现于我们，只是由于我们不是逻辑的或形而上的实体，而是异于而且多于逻辑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实体”^[6]。人的本质便摆脱了思想客体的束缚，其落脚点也由作为“神”的思想客体转变到“作为类的人”的直观主体上。费尔巴哈强调，“只要你在上帝里只是体现你自己的特殊性，你就是在原始本体里只是神化你自己的本质；因为你要找出异于人的东西，既然只有自然，只知道自然，那么反过来你要找出异于自然的东西，也就只有人，只知道人”^[7]。即是说，人把上帝神化的过程不过同于自然实体的人化过程，其中唯一存在的矛盾就只是人与他的对象物即自然的矛盾。在其中，人所特有的理性、情感、意志作用于自然，从而使人的本质高于自然。

在费尔巴哈那里，人的本质不再依靠“神”这一精神实体表现出来，这无论如何都表示人的主体地位的重新确立。不再有一个凌驾于人之上的思想实体或对象存在。人也因此有了思想空间和行为空间，能够在自然之中自由、平等地发展成为完善者。由此可见，费尔巴哈至少完成了一个工作：将人的本质及其现实性拉回到人对其自身的关系上。这样，一方面，非人的本质被消除了，另一方面，人本身成了理解其历史活动的出发点和中心。至少在其后的理论史中，人便不需

要寄希望于在一个虚无的思想客体中寻求人的本质及其现实性，而是在人与其现实对象的真实关系中映现人的本质，即由对象意识到自己，进而意识到自己的本质。人更加不会受到思想客体那不能违抗的权力的压迫，而是在作为他的主要活动的对象中意识到那属于他的“固有而客观的本质”。就如费尔巴哈所言，“主体必然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如果这个对象是若干同类而不同种的个体所共有的，那末，它就至少像它按照不同的特点分别成为这些个体的对象那样地成为这些个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8]。

二、在对象中显现：对象是人的公开的本质

在某种意义上，人的本质也是在同其他动物的比较中得来（在西方思想传统中，一直有人高于动物的普遍观念）。在费尔巴哈看来，人与动物之所以不同，在于人具有作为类的意识，也正是类意识引导人们走向完善，达成人的本质。诚然，动物也有自己的心理活动，不过它们的心理表现为对外界事物的知觉，而且是有限的知觉，严格地说是出于本能。动物因其有限的心理，只能在有限制的生存区域之内进行单一的生活，因此，它们无法得知自己的生存到底出于何种目的，它们在本质上是受动的自然存在物。另外，它们并不能以自身为思维对象，也不能以自身为话语对象。由此，对于人以外的动物来说，它们就不能行使“类”的职能（思维、交谈），也就无法意识到自己是“类”存在物。而人即便没有外在个体相伴时，也能以自身为思想的对象和语言的对象，即能够真正行使作为“类”的职能，因为人的意识不同于动物，是无限的意识，是把自己的本质之无限性当作对象意识。人因为具有类的意识而知道自己真正向往的是更高、更完善的东西——所谓“真正的存在者，是思维着的、爱着的、愿望着的存在者”^[9]。因而，人设想上帝作为无限的存在物，借上帝展现自身的完善性——理性、意志、爱或心，即费尔巴哈所认为的人的本质的

核心内容。人的本质被对象化为上帝，上帝愈完善，人的本质力量本应愈强大。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展现的力量不是他作为人独有的力量，而是人的本质力量（理性、意志、爱或心）的体现，这种本质力量就是人生存的目的——人的类生活就是由实现类本质的一切活动组成的。而如果作为类的意识不具有无限性，不能感知到对象及其完善性，那么实际的存在者就无法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更无法意识到自己的本质为何物。借助上帝这一实体（同时也是人的对象），“人的本质在对象中显现出来：对象是他的公开的本质，是他的真正的、客观的‘我’”^[10]。

早期的马克思也认同费尔巴哈有关人的类意识、类存在物的观点——“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的对他来说是对象”^[11]。不过，在马克思看来，人之所以是有别于动物的类存在物，本质上是由于他们的能动的生产活动。人与动物虽一样进行着生产活动，不过二者之间的生产活动性质不同。动物的生产是作为片面的、为自身的生产，即生产活动在动物身上表现为在有限制的区域内满足肉体 and 生存需要的活动，是一种受动的活动。人作为类存在物而进行的生产是全面的生产，是能够满足除了生存需要以外的各种需要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一种能动的活动，是一种将人与自然界联系到一起的活动。在自然界中，人既是自然存在物，又是自为存在物。一方面，人作为具有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同其他动植物一样受到束缚和制约，由此产生对自然的依赖，表现为受动的状态；另一方面，人又是具有自然力和生命力的有类意识的存在物，具备适应并改造自然的力量，表现为能动的状态。这种能动性也使人区别于动物，正是因为人的能动性活动使得人在自然界中既能获得精神的享受，也能不断满足个体以及作为类存在物的整体物质需要。人的能动性、创造性活动实现了自然界与自身的联系，人的本质也借此在自然界与自身的真实联系中得以

体现。

“类”是共同性、普遍性。人有意识地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将自己视为类存在物，这无疑是对人的自然共性的某种肯定。但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12]。在他看来，人的本质不再固着于个体，而要依据于他人。因为“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13]。在《提纲》中，人的本质被进一步视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就指出，“现实的人总要参与生活，和周围的人发生关系，因而纯粹的单独的一个人是不存在的，人只能被设想为是社会的人”^[14]。但是社会并非天然存在的，也就是说，个体的存在先于社会的存在。当处于“自在存在”阶段的人为了生存、为了满足需要而成为“为他性存在”的个体时，当他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自己的本质）时，社会属性才不断显现。作为现实的人，他无法摆脱各种社会关系而独立存在，正如美国政治哲学家奥尔曼所说，“人关于自我的意识以及关于他与他人、他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的意识都是他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物的意识，因为他考虑问题的方式就是他的一项社会功能”^[15]。因此，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而理解人的本质必须以社会过程的展开为媒介，或者说将其放在社会过程的展开中加以理解。

对此，费尔巴哈理论的薄弱之处就比较明显了——费尔巴哈即使深刻说明了人的本质在对象中显现，但他只是一般性谈论人及其对象，进而只是一种抽象。基于此，费尔巴哈就老生常谈地认为要靠“爱的威力”（人对人的爱）去实现人的最高本质，因而在人性论上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基督教文化色彩。实际上，“爱”这一道德原则并不会跑来使人神圣化、圣洁化，而只会在现实的社

会关系中成为人的本质异化的某种精神支柱。恩格斯对此认为，“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16]。

三、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人的本质的现实性暨可创造性

在社会意义上，人创造了大量而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也创造了满足他人生存需要的手段，借此达成自由且丰富的本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的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17]。也就是说，至少在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劳动者的生产活动只停留在动物本能活动的水平，更谈不上发展性、丰富性。其全部缘由在于，人在这一阶段中成为被私有财产支配的存在物，其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都归属私有财产的所有者。从而，人的劳动不是自身的对象化活动，不是自身的创造性的显现。当劳动不能被用来区别人与动物时，或者说当劳动这种人的特殊的生命活动在其表现形式和最终目的上与动物的活动无异时，就不必说劳动之于人的本质的形成的意义了。

在国民经济学看来，私有财产是劳动的产物，不是外在于人的，因而就至少在表面上承认人。但国民经济学的“承认”，只是承认一种抽象的劳动原则，有意丢弃了劳动的“地域的、民族的等等的规定”。无论国民经济学所承认的“劳动”怎样具备工业的现实的力量，它都是敌视现实的劳动者的，都是对活劳动的否定。正如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的那样，“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其实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因为人本身已不再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而是人本身成了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本质”^[18]。私有财产的这种否定性，归根结底是源于其支配人并将人束缚在行使“动物机能”的层面上。人的生产生活便不再是自由自觉

的活动，进而导致人的本质的虚无。

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其中有趣的现象在于，资本家总是从个人眼光看待社会以及其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既与工人群众形成对立（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也与其他资本家形成对立（竞争的关系）——马克思谓之“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认为，这是由于“个人的原则和社会的原则，即资本作为私人财产的功能和它的客观的经济功能处于一种相互之间不可解决的辩证矛盾之中”^[19]。在消费社会的情境下，资本主义仍旧从个人原则出发鼓吹人在社会中追求极致的个体享受和娱乐性，导致人直接丧失了追求“自由全面”的内在动力。而马克思在《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0]。这意味着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人的本质具有社会性；同时，意味着人的本质是随着历史变化不断变化的，因而具有可创造性。换言之，人的本质是在人类社会的整体过程中形成、建构和发展的，这与《手稿》中对于“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的观点仍旧具有内在一致性。因此，全部的问题都在于如何扬弃私有制和私有财产所导致的异化，实现所谓的“人的本质的复归”。

一是扬弃意识领域或者说人的内心领域的异化。宗教、家庭、国家（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等是私有财产的观念统治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观念上的反映，形成对人的头脑精神的支配和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抑制。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扬弃意识领域或者说人的内心领域的异化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21]。而这种扬弃是人的本质从神权等统治观念的奴役中摆脱出来并获得现实性的前提。并且，遮蔽人的本质的幻想迷雾一旦被揭开，人也便重新生成关于人的本质的正确意识，即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实践把握人的本质并不断创造人的本质的现实形态。

二是扬弃经济的异化或者说现实生活本身的异化。经济的异化或者说现实生活的异化是由私有财产的运动（私有财产对生产过程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整体支配）导致的。私有财产的运动本身形成了所谓的“生产的普遍规律”，成为凌驾于人的活动之上的规定。而一旦规律代替了人的活动，生产需要代替了人的需要，人的本质就其内容及其外在表达来说都不会再存在了，个体及主体也被湮没在资本主义的庞大的生产机器当中。然而，资本主义机器的生产更加不会考虑人性，只会既损害人的活动又剥夺人的享受。扬弃经济的异化或者说现实生活本身的异化，必须仰赖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借此在“与私有财产相对立的历史形态”中寻找答案。而且，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本质才会获得真实的现实性，正如马克思所言，“共产主义……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2]。

无论在《手稿》中，还是在《提纲》中，马克思都格外强调人的本质的“社会性”，即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性地生成及创造的（在《提纲》中，“改造世界”的提法实际上具有“生成和创造人的本质”的意味）。马克思将“人的一切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作为人的本质复归（获得它的内在丰富性）的现实结果。

在私有制下，人的感觉仅仅是“拥有的感觉”和“实际需要的感觉”。此时，对于一个对象，只有当人们占有它时才能感觉到这个对象是属于他的，并且这种感觉并非对象天然形成的给人的感觉。但是，“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23]。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人的感觉具有利己主义性质和严重的片面性——个体的器官不认为自身是作为社会的器官，个体对对象的感性占有也不是按人的方式的占有。而人的本质的丰富性，却是须借助感官把握对象所形成的感性丰富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眼睛对对象

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眼睛的对象是不同于耳朵的对象的。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24]。只有当扬弃了私有财产的异化，并占有了自己全部的感觉的特性的时候，我们也才能确信“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25]——人的本质才能实现复归并具有真正的现实性（所谓的“按人的方式”得以实现）。

四、结语

“如何理解人的本质”是极为重要的哲学命题。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关于“人的本质”的讨论，构成了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人学的问题核心。理清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的人的本质观的思想转变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人性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解读的过程。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从神权当中解放出来，从人与自身的关系出发看待“人的本质”。而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的现实性还原为社会性，并主张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扬弃私有财产造成的社会异化，进而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尤其须注意到，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定义人的本质，不再假定人的本质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强调其生成性和创造性——这是马克思所谓“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本真之义。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26]。我们还要经过长期的物质和精神的财富积累，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发展

我们的感性特性，才能取得人的本质及其全部现实性——至少说来，只有通过扬弃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运动才能使之完成。

参考文献：

- [1] 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 [M]. 顾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33.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09.
- [3][5][6][7] 费尔巴哈. 宗教的本质 [M]. 王太庆,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21、9、26、51-52.
- [4][8][9][10] 费尔巴哈. 基督教的本质 [M]. 荣震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49、37、35、37.
- [11][13][17][18][21][22][23][24][25][26]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53、56、51、71、79、78、84、83、297、77-78.
-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301.
- [14] 陈学明. “西方马克思主义”命题辞典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4: 87-88.
- [15] 奥尔曼.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M]. 王贵贤,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143.
-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47.
- [19]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 [M]. 杜章智, 任立, 燕宏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122.
- [20]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54.

责任编辑: 鲍跃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 “大思政课”建设研究

董西飞

摘要:高等学校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重要阵地之一,肩负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责任。思政课在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中发挥着主渠道作用,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是提升育人实效的必然选择。在当前的融入过程中,存在教育理念有待更新、课程协同性不强、资源平台运用不足等现实困难,需要打牢理论根基、夯实教学基础、培养情感纽带、强化技术支撑,全力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思政课;高校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1]。高等学校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重要阵地之一,必须毫不犹豫地扛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责任,立足新时代高等教育和民族教育发展实际,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思政课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是高校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

政教育的主阵地,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渠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2022年7月,教育部等部门印发了《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对如何开展“大思政课”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既是当前开展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大势所趋,也是做好新时代高校民族工作的题中之义。

收稿日期:2024-05-18

作者简介:董西飞,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思政教育、政治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网络思政教育改革研究课题“传播学视域下网络思政教育有效性提升路径研究”(YWSZ202204)、南京邮电大学红色校史研究项目“红色校史融入思政教育的实践路径研究——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建模与仿真”(HSXS22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面临的现实困难

(一) 教育理念有待更新

1. 不同高校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教育投入不均衡

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纳入“大思政”课建设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民族院校以及位于民族地区的高校,由于当地人文历史和区域性政策的实际情况,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视程度更高,在课程设置和校园文化上发力。有的开设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等课程,有的以“民族文化进校园”为重要抓手,在课堂外开展音乐、手工艺等多种方式的课程与实践体验活动,丰富了课堂形式^[2]。相对而言,其他高校的教育着力点更多是放在预科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身上,以做好预科学生“混学”“混宿”等管理工作为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在整个“大思政”育人格局中地位不突出,课程设置对校园文化中的民族元素重视程度相对不足,缺少专门开发的课程或课程体系,通常以一般的思政教育进行覆盖。

2. 部分教师的认识不到位,教学效果不理想

和其他的学科知识一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要想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就必须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融会贯通。而现实情况是,部分思政课教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概念缺乏深入系统学习,教学技能和专业水准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对自身的执教能力也不够自信,缺乏对学生的情感调动。教学方式比较单调,民族教育相关课程多采用以教师的“教”为主体的全包制教学模式,授课模式大多沿袭传统的说教式,同时囿于授课主题的严肃性,教师在课堂上可发挥的余地较少,课堂互动环节设置不足,使用新技术教学手段有限,较难激发学生

的热情和兴趣,更难产生共鸣,教学效果不理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凝聚力、感召力尚未通过教学得以充分体现。

(二) 课程协同性不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有效融入“大思政课”建设,需要从整体视角出发,打破学科界限,建立起有效的协同育人机制,然而,现实中高校内部尚未建立成熟的课程协同育人体系。

1. 思政课程之间协同度不够

涉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教学内容较多,分布在多门思政课程中。普通高校思政课程在本科阶段包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等5门必修课,在硕士研究生阶段一般设置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等3门必修课,在博士研究生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纲要”一般也作为必修课^[3]。在实际教学中,一些高校已经开始重视思政课之间的协同,通过组织集体备课、开展联合教学等方式加强不同思政课程之间的联系,而有些高校仍然保持着相对独立的教学模式,缺乏协同意识,思政课之间往往存在知识点的交叉和重叠,教学连贯性不足且造成资源浪费。

2.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之间互通不足

传统的专业课程教学主要讲授专业知识和训练专业技能,而思政教育主要传授思政知识,近年来,教育部多次强调并推进“课程思政”的建设,并发布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为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向和具体要求,助推专业课程和思政教育的融合互通。但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相对于文科类专业,工科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融合的难度更大,有些教师可能只是随机地、零散地加入一些思政元素,而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使得思政教育缺乏整体性和深度。加之学校层面对课程思政的顶层谋划不完善,思政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平台,导致思政课与其他课程之间的融合不够紧密,缺乏课程联动,未能将教育目标与育

人实践、知识传授与思想启迪有效结合。

（三）资源平台运用不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通过搭建大资源平台提供多样的教育教学资源，促进信息共享与交流，实现个性化学习推荐，从而不断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质量。但从当前实际情况来看，高校与外部社会力量在构建协同育人机制方面存在不足。

1. 未能充分利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践基地

当前，诸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博物馆、革命纪念馆被设为高校思政教育实践基地。但相对于民族类高校，普通高校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践基地之间的合作较少，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也不是实践基地建设的重点领域。在目前已有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使用和建设上，受限于交通、资金、安全等实际因素影响，开展现场教学的次数较少，实践教育活动开展的频率以及覆盖面不足，实践教育基地的核心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

2. 高校与相关部门的互动不足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实践中，高校对相关部门出台的相关政策和文件的解读和利用不充分，存在信息沟通不畅问题。同时，高校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通过相关部门转化应用不足。高校较多的是接受和执行相关部门布置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任务或项目，较少基于自身教育理念和资源优势，主动联系相关部门开展合作，校内外协同育人的效果并不理想。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的方法路径

（一）打牢理论根基，以理论研究带动理念更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大思政课”建设，必须坚持理论先行，打牢理论基础是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融入“大思政课”的关键钥匙。高校在科研方面具有学科资源丰富、研究力量较强的优势，要用好这一优势，加强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方面的研究，为育人实践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以理论研究带动教育理念的更新，在专任教师和学生工作教师中营造懂理论、能研究的学术氛围，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旋律深入人心。

1. 建强民族理论相关学科

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础理论研究放到更为重要的位置，加大多方面的支持力度和资源投入，努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鼓励多学科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研究。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均能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相关联，并且能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维度就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等方面开展研究。多学科的共同探索和融合有利于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价值意蕴和实现路径的学术研究。

2. 营造浓厚学术研究氛围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任教师一般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背景和教学经验，能够系统、深入地开展思政教育理论研究，他们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理论研究力量。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研究需要多元化、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因此应该鼓励更多的学者、研究人员和实践工作者参与进来。同时，思政教育的实践工作者，如辅导员、管理人员等，也是重要的参与力量，他们的工作经验和实践案例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和验证。

（二）夯实教学基础，以队伍建设提升育人实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大思政课”建设，必须发挥好课堂教学在育人中的主渠道作用。针对当前存在的教育方式缺乏灵活性、内容过于宽泛、教学能力不足等问题，高校需要进一步打造高质量的思政教育课堂，建设满足时代需求的高质量教师队伍，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纳入“全员、全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中。

1. 发挥好课堂教学的育人主渠道作用

要提高教育方式的灵活性，增强思政教育的实效性，改变以说教为主的大水漫灌式教育模式。在课堂上通过讲故事、放视频、开展互动等方式，提高教学效果；在实践教学积极开展参观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开展志愿服务等活动；要注重网络空间资源的开发，用好互联网新技术新手段，以更多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进一步激发学生思政课学习的兴趣。同时，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专业课教师可以积极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专业知识传授中融入价值引领，结合本专业特色，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民族团结进步元素，将其有机融入课堂教学，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2. 打造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进教师培训，鼓励和保障教师参加相关培训，促使教师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方面的知识，增加中华民族共同体方面的知识储备。进一步提升教师的教学专业能力，理解和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和教学方法，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大学生的特点，在工作实践中自觉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可以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纳入教育考核考评，营造重视相关教学的制度环境，促使教师自觉将弘扬家国情怀和民族情怀融于教学过程。

（三）培养情感纽带，以浸润式环境形成育人合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要用好社会大课堂，坚持“生活即教育”的教育理念，积极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校园环境。同时，组织开展社会实践和文化交流活动，在工作、学习和生活各方面加强各族师生的交流交融、互动沟通，于细微之处不断熏陶，

进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入行，培养各族师生浓郁的情感纽带。

1. 打造民族友好型校园软环境

在学生管理中，健全少数民族学生日常生活管理和服机制，嵌入体现人文关怀的工作内容，关爱和帮扶少数民族学生更好融入大学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例如，高校可以根据少数民族学生的具体情况来配备生活辅导员，贴近学生进行沟通，帮助他们排解学习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引导他们更好地规划未来发展方向，让他们感受到来自学校的全方位的关心关爱。推动各族学生在高校嵌入式环境中交流互融，引导各族学生在生活上彼此关爱、相互照顾、多方交流，进而推动形成共同的正确的价值观。还要充分利用校园各类文化社团组织和党团教育活动，打造各族学生共享的文化品牌活动，精心推进“植入性”宣传，使学生在各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中正确认识中华文化。在重要的少数民族节日和中国传统文化节日中，组织各族师生共同参与，让他们共同展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底蕴和文化魅力，从而增强各族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知、认同，推动他们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欣赏。

2. 组织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实践教育活动

高校要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联系，做好政策解读与教育资源对接工作，建设合作平台，共同开展社会实践教育活动。以田野调查、劳动教育、支农支教等多种形式，带动大学生深入基层，特别是到民族地区开展各类社会志愿服务活动，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地区发展作贡献。要鼓励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就读地区参加实践活动，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了解就读学校所在地区和城市的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历史文化以及生活生产、民风民俗等情况。社会实践活动要注意吸纳不同民族学生参与，使各族学生在实践中共同拼搏奋斗、体验艰辛与喜悦，在其中交流思想、增进感情，使各族学生在社会志愿服务活动中增进

了解,在体验社会中加强交往交流交融。发挥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的作用,组织学生参观民族史档案馆、博物馆、革命历史纪念馆等场馆,开展红色文化和民族文化现场教学,开展民族发展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教育,使学生体悟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真谛。

(四) 强化技术支撑,以多元平台传播团结声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大思政课”建设,离不开当前互联网发展的时代背景。一方面,当代青年大学生是成长于互联网等新技术突飞猛进时期的一代人,处于纷繁复杂和碎片化、多元化的网络信息环境中,“历史虚无主义”“个体民族意识”等各种错误思想观点通过网络进行传播和渗透,容易引起大学生的思想混乱。另一方面,网络新媒体等技术工具的合理运用,在课堂和课外教学中有助于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学效果。这需要加强对新媒体、新技术的了解和运用,打造多元化的平台,在高校大学生中更为有效地传播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声音。

1. 打造多维的交流平台

一方面,充分发挥校园媒体普及性和覆盖性的优势,在高校网站、报刊等媒介上开辟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民族团结进步、中华一家亲等主题宣传栏目,及时推送有关民族团结的知识、理论文章、重要会议精神等,宣传民族团结模范集体和个人事迹,传递民族团结正能量。另一方面,及时采用媒介新技术,运用短视频、Vlog等当下青年受众易于接受的传播方式,在微信公众号、

微博、抖音等平台上加强与大学生的交流互动,让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更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此外,在高校网课平台上精选有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课程和纪录片供学生学习,提供更多可学习资源。在学生参与民族团结相关的社会实践后,还可遴选学生自己制作的课程或微电影在平台上发布,调动学生宣传和维护民族团结的热情。

2. 建立监测监管机制

高校要加强对学生浏览网站监测监管,防止学生受到不良思想的侵害和影响。要通过大数据、与网信部门的信息交换等多渠道,及时发现学生在网络媒体上发表的涉及民族问题的不当言论,及时进行批评教育,有效引导学生的思想和言论走向。要做好校内媒体平台内容发布的监管,加强对内容的审核,防止出现有损民族感情、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论。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39.
- [2] 周俊利. 铸牢民族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文化纽带视角[J]. 民族学刊, 2021(2): 9-16.
- [3] 李芳. 高校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基本问题探析[J]. 民族教育研究, 2020(4): 33-40.

责任编辑: 吉强